

为基督受苦

理查得·魏恩波

版权：©1967，理查得·魏恩波
1967年首次在英国出版
本版发行于2005年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英文圣经经文摘自新国王钦定本（版权1979，1980，1982，Thomas Nelson Inc. 出版社-位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

理查得·魏恩波先生的著作权已由他自己根据1988年版权、设计和专利法进行声明。

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均不得复制、存储在检索系统中或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传输，未经出版商事先书面许可，也不得以任何形式装订或封面进行传播，除非与本出版物的发行和销售条件相同。

英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物目录记录
这本书可从英国国家图书馆获得
ISBN 978 0 340 86368 8
排版者：Avon Data Set Ltd.

位于 Goudy, Bidfordd on Avon, Warwickshire

印刷：CPI Group (UK) Ltd. 于 Croydon, CR0 4YY, 英国
本平装书采用的纸张和纸板均为可再生的自然产品，源自可持续发展的森林中种植的木材。制造过程符合原产国的环境法规。

Hodder & Stoughton
Hodder Headline Ltd 的分部，
位于伦敦西北1区欧斯顿路338号，邮编 NW13BH
www.madeaboutbooks.com 和 www.hodderbibles.co.uk

目录

第一章 苏联人渴望基督	3
一个无神论者寻找基督.....	3
我对苏联人的事工.....	4
教会被诱骗.....	5
苏联人——一个灵魂饥渴的民族.....	7
在苏联军营中传福音.....	9
我们对被奴役国家的地下事工.....	14
地下教会如何半公开活动.....	15
卧底工作.....	16
第二章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18
不可言喻的酷刑.....	18
抵制洗脑.....	21
短暂自由——而后再次被捕.....	22
我们的协议：我们传，他们打.....	23
我妻子与儿子怎么了？	25
“米海，信耶稣！”	26
第三章 被赎获释，到西方工作	28
我为什么离开共产主义罗马尼亚.....	29
第四章 以基督的爱，击败共产主义	31
我们如何喜乐——哪怕是在监狱里.....	33
我们如何在灵里进攻共产主义.....	36
遗忘了的历史教训.....	39

我获得释放后，找到了什么？	42
为何我在西方也受苦.....	47
第五章 无敌而又广泛传播的地下教会	54
地下教会如何“吸收”无神刊物为己所用.....	59
为什么连共产党员也能得救.....	61
地下教会的组成部分.....	65
第六章 基督教如何战胜共产主义	68
冰山一角.....	68
对地下教会的迫害日益加剧.....	77
第七章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帮助	84
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可以如何帮助.....	85
我们极需圣经.....	86
基督徒殉道者家属的悲惨遭遇.....	88
地下教会委托我带给你们的信息.....	88

第一章 苏联人渴望基督

一个无神论者寻找基督

我从小就成了孤儿。我成长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里，童年时期没有接受任何宗教教育。由于经历了苦难的童年，包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艰难岁月里感受到的贫困，14岁时的我已经和今天的共产党人一样坚定地成为了无神论者。我读过无神论的书籍，我不仅不相信神或基督——我甚至憎恨这些观念，认为宗教对人类心智有害。因此，我对宗教怀有深深的怨恨。

但后来我明白，我有幸成为了神所拣选的人之一，这个恩典是我无法理解的。这个原因与我的性格无关，因为我的性格非常糟糕。

尽管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总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吸引我走向教堂。我发现自己很难经过一座教堂而不进去。然而，我从未真正理解这些教堂里发生的事情。我听过讲道，但它们并没有打动我的内心。我对神的观念是，祂是一个要我事事听从的主人。我憎恨自己心中这种对神的错误观念；但却很向往宇宙中有一颗爱我的心存在。因为我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缺少快乐，因此我渴望有一颗爱我的心为我跳动。

我说服自己神并不存在，但又为不存在这样爱的神而感到悲伤。有一次，内心里的挣扎促使我走进一所天主教堂。我看见人们跪下，喃喃祷告。我想，如果我也跪在他们身边，学他们一样祷告，也许会有一些事发生。他们正在向童贞女马利亚祷告：“充满恩慈的马利亚”。我抬头注视着马利亚，不断重复地跟他们念着这些祷告词，但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感到十分沮丧。

有一天，当我还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时，我向神祈祷。我的祷告是这样的：“神哪，我十分肯定你不存在。但如果你真的存在（我对此提出质疑），那么不是我的责任要先相信你，而是你的责任要先向我显示你自己。”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无神论不能给我平安。

在我这段内心冲突期间，一位住在罗马尼亚高山地区的年迈木匠这样祈祷：“神哪，我在世间服事了您，我希望在世上得到和天上一样的

回报。我要的回报是，在我未死之先，可以带一个犹太人归向你，因为耶稣是犹太人。可是目前我贫老多病，不能到处去找犹太人。我村里也没有犹太人。求你带一个犹太人来这村子，我就尽力带领他认识基督。”

我不能解释我为什么会到那个村庄，我在那里并没有任何事要办。罗马尼亚有一万二千个乡村，但我却偏偏去了那个村庄。当那木匠发现我是犹太人时，就殷勤地接待我，其热情程度决不亚于人在竭力追求一位美丽少女时的殷切！他知道我便是神对他祷告的应允，他给了我一本圣经让我阅读。我以前出于文化的兴趣，曾多次读过圣经。可是这位木匠给我的圣经却完全不同。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和他太太为了我和我妻子的悔改，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了许久。他给我的圣经不是用普通文字写的，而是用他的祈祷所点燃的爱的火焰书写的。我几乎不能阅读它，我只能哭泣。我看到我污秽的生命与耶稣公义的生命；我的恨与耶稣的爱——耶稣接纳我成了祂的人。

不久以后，我的太太也悔改了。她也带领其他灵魂归向基督。那些人又带领更多的人归向基督，于是罗马尼亚就又多了一个新兴的信义会团契(Lutherans)。

不久纳粹上台，我们大大受苦。在罗马尼亚，纳粹党采取了极端东正教分子的独裁形式，迫害新教团体和犹太人。

在我还没有正式成为牧师之前，我已经是这个教会的领袖，因为我是它的创始人，我必须为它负责。我和太太多次被捕、遭殴打，被强行带到纳粹法官面前。纳粹党的确可怕，但比较后来的共产党，不过是小儿科。当时我必须给我的儿子米海取一个非犹太名字，免得他被杀害。

但是那个纳粹时期却有一种好处，就是使我们看到，外体的殴打是可以忍受的，人的灵若得到神的帮助，身体就能承受可怕的折磨。它又教导我们基督徒秘密工作的技巧，为即将到来的更艰难的日子做准备。

我对苏联人的事工

由于我懊悔自己曾是一个无神论者，于是从悔改那天开始，就渴望向苏联人传福音。苏联人自小就受无神论熏陶。不久我这渴望就获得满

足，我不用去苏联就可以接触到他们：这始于纳粹时期，因为在罗马尼亚有数千名苏军俘虏，我们就得到机会向他们传福音。

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动人事工。我决不能忘记第一次与一名苏联俘虏的谈话。他是一个工程师。我问他是否相信神。如果他说不信，我不会感到希奇。每个人都可以信或不信。但他却迷茫地望着我说：“我没有接到上司的命令叫我相信。如果上司这样命令，我就信。”

我心都碎了，眼泪直流。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思想已经死亡的人，这人已经丧失神给人的最大恩赐——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共产党手中他已经被洗脑成了一个机器，随时听从信或不信的命令。他不再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一个地道的苏联人，是多年共产党统治的结果！看到共产主义对人类的作为之后，我向神许愿，我要献身于这些人，恢复他们的人格，让他们对神和基督有信心。

从1944年8月23日开始，一百万苏联军队入驻罗马尼亚。不久共产党就在我国掌权，我国的噩梦开始了。相比之下，纳粹时期的逼迫不过是轻微的。

那时罗马尼亚的人口已经有二千四百万，共产党员的人数却才一万。可是苏联外交部长威辛斯基（Vishinsky）却冲入我们敬爱的国王米加勒一世（King Michael I）的办公室，拳击桌面说：“你的政府必须任命共产党员。”我们的军队和警察就被解散，共产党凭着暴力上台，全国人民为此而愤慨。这事在当时居然得到了美英两国领袖的支持。

人们在神面前不仅要为个人的罪负责，也要为国家的罪负责。所有被奴役国家的悲剧都是美国和英国基督徒心中的责任。美国人必须知道，他们有时在不知不觉中协助苏联人在我们身上强加了一个谋杀和恐怖的政权。作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美国人必须通过帮助被奴役的人民归向基督之光来赎罪。

教会被诱骗

共产党得权后，就开始误导教会。爱的言语和诱骗的言语是相像的。一个要娶一位少女作太太的，和一个只要和她睡一夜的，都会说：“我爱你”。耶稣吩咐我们要辨别真爱与假爱的声音，晓得真羊与披着

羊皮的狼。遗憾的是，当共产党开始掌权时，数以千计的牧师、神甫和传道人都不晓得如何辨别这两种声音。

共产党在我国的国会大楼举办基督教大会，有四千名各宗派的代表出席；包括神父，牧师与传道。这四千代表推选斯大林为大会名誉主席。斯大林同时也是世界无神机构的主席，和大量屠杀基督徒的元凶。主教与牧师一个接一个在国会轮流发言，宣称共产主义和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可以共存。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称颂共产主义，并保证教会将效忠新政府。

我和我太太一同出席这场大会。太太对我说：“理查得，起来洗去基督脸上的羞辱！他们在祂脸上吐唾沫。”我对她说：“如果我这样做，你就会失去你的丈夫。”她说：“我不需要儒夫做我的丈夫。”

我就起来称颂，不是称颂屠杀基督徒的凶手，却称颂神与基督。我说我们首先应对基督忠诚。当时这大会是现场直播，全国都从这共产党大会主席台上听到了基督的信息！后来我必须为这次的发言付上代价，但却值得。

东正教和新教的牧者们争先向共产主义献媚。一名东正教主教把镰刀和铁锤标志缝在自己的圣袍上，又吩咐手下的众神甫不要再叫他“主教阁下”，而要称他为“主教同志。”神甫如巴特拉 (Patrascoiu) 和罗西亚 (Rosianu) 更直接，他们干脆成为秘密警察的官员。罗马尼亚信义会的副主教拉普 (Rapp) 开始在神学院教导说，神给世人三大启示：第一个来自摩西；第二个来自耶稣；第三个来自斯大林；而第三个比前面二个更大。

我参加一个在黎世达 (Resita) 的浸信会大会。这大会高举红旗，众人起立高唱共产苏联的国歌。大会的主席称赞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圣经教师，并宣称斯大林成就了神的命令！

我们必须晓得，我所爱的真正的浸信会信徒完全不认同上述的领袖。他们依然忠于基督，也为基督大大受苦。但共产党“推选”了他们的领袖，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今日共产国家的

“官方”⁽¹⁾教会。那些成为共产主义仆役（而不是神的仆人）的教会领袖，就开始攻击不认同他们的弟兄们。

苏联基督徒在苏联革命后，开始创立地下教会。共产党在罗马尼亚摄取政权后，官方教会领袖出卖教会，于是我们被迫开始在罗马尼亚也创立一个地下教会：这地下教会忠心传扬福音，包括向孩童。共产党全面反对地下教会；官方教会也依从了共产党的路线。

我与其他人一同开始地下工作。我有一个很体面的地位，正好作为掩护。这外表的地位便是：我是挪威信义会传道会的牧师，又是普世教会联会在罗马尼亚的代表。（当时在罗马尼亚的我们决没有想到普世教会联合会竟会与共产党合作。那时在我国，这团体单单从事救济事工。）这两个头衔给我在当局面前有很好的信誉。当权者不晓得我的地下工作。

我的地下工作包含两方面：首先是面向苏军士兵的秘密事工。其次是面向罗马尼亚受奴役之百姓的地下服事。

苏联人——一个灵魂饥渴的民族

对我说来，向苏联人传福音是如同在地上享受天堂。我曾向多国的人民传福音，可是未曾见过像苏联人那样如此地渴慕福音，他们是一个灵魂饥渴的民族。

有一位东正教神甫，是我的朋友，来电通知我说，一位苏联军官找他，要求告解、认罪。我这朋友不懂俄语，于是就把我的地址给了他，因为知道我懂俄语。第二天那位军官来了。他渴望神，可是未曾见过圣经。他没有受过任何宗教教育，也未曾进过教堂（苏联教堂稀少）。他爱神，却完全不认识祂。

我向他朗读登山宝训和耶稣的比喻。他听了就在房间里高兴地跳舞说：“太奇妙，太美丽了！我不认识这位基督，我如何能活着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如此因基督而欢乐。

¹：注：官方教会是指在政府注册，由政府控制的教会。如今在集权国家的官方教会会员一般小于百分之十。其他信徒宁愿在地下教会敬拜。

可是我随即犯了一个错误。我向他朗读基督被卖和受难，却没有给他心理准备。他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当他听到耶稣如何被打、被钉、并死亡时，就倒在椅子上哭泣。他曾相信一位救主，但如今这救主却死了！

我看着他，自觉惭愧。我是基督徒，又是牧师和教师。但我从来没有像这位苏联军官一样体会基督的苦难。我看见他，就仿佛看见抹大拉的马利亚在十字架下痛哭，甚至在耶稣的尸体被埋葬后仍然哀哭不忍离去。

然后我读到了耶稣的复活，这时我观察到他的表情改变了。当他听到这个奇妙的信息后，就拍打双膝，发出一个污秽不堪的（但我听来却是最圣洁的）咒语。这是他的粗俗说话方式。他又开始在房间跳舞，无比兴奋地喊道：“祂活了！祂活了！”

我对他说，“我们祷告吧！”他不会祷告，也不会我们“神圣的”祷告词。他和我一同跪下，就说，“神哪，你真是个非常好的家伙！如果换成我是你，而你是我的话，我决不会放过你的罪。但你确实是个非常好的家伙！我全心爱你！”

我想天上的天使们也会停下工作，听这个苏联军官的崇高的祈祷。这人已经被基督得着了！

在一所商店，我看到一位苏联上尉和一位女军官，正在购买各样的东西。店员不懂俄语，难以了解他们。我就自愿上前为他们翻译，我们因此互相熟悉起来。过后我请他们到我家里吃中饭。餐前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正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我们习惯在餐前祷告。”我就用俄文祷告。他们不再对食物感到兴趣，放下刀叉，开始询问有关于神、基督、并圣经的问题。他俩对这些一无所知。

和他们谈话并不容易，因为他们已经被共产主义思想洗脑了。我告诉他们失羊的比喻；他们就问：“那人怎么有一百只羊？共产党的集体农场还没有充公那些羊吗？”我说耶稣是王。他们就说，“所有的王都是挟制人民的暴君；耶稣肯定也是个独裁者。”我告诉他们有关葡萄园租户的比喻，他们就说：“这些租户就是应该反叛葡萄园主。葡萄园该归集体农场。”每一样事物对他们来说都是新的。我告诉他们有关耶稣的出生；他们就问（在西方人看为亵渎的问题）：“马利亚是神的太太

吗？”我开始认识到，要向经过多年共产统治的苏联人传福音，必须用全新的方法。

这道理也适合其他文化。到中非的传道人难以翻译以赛亚的话：

“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以赛亚书1章18节）”中非没有雪，当地的言语也没有“雪”这字。于是传道人就翻译道：“你们的罪必白如椰子肉。”

于是我们必须把福音翻译成马克思主义者所能明白的言语。这不是我们靠自己能办到的——但圣灵可以通过我们做成祂的工。

那个上尉和那位女军官当天就悔改。过后他们极大地支持了我们向苏联人传福音的地下工作。

我们秘密印刷了数以千计的福音书和其他基督教读物，在苏联人中分发。透过悔改的苏联士兵，我们私运了许多圣经和单行本到苏联本土。我们还有一种传福音的方法，能把神的话送到苏联士兵手中。苏联已经打仗多年，许多士兵久别儿女，心甚思念（苏联人十分喜欢小孩）。我的孩子米海，和其他不到十岁的孩子们，口袋里装满了圣经、福音书等读物后，就会跑到在街头或公园的苏联士兵当中。士兵大哥就会拍着他们的头，友爱地和他们说话，同时想及自己久别的儿女。士兵们会给孩子们巧克力或糖果。孩子们就拿出口袋中的圣经和福音书，作为回报。士兵们都很乐意接受。这对我们成年人来说是及其危险的行动，对孩子却完全没有问题。这些孩子是向苏联人传福音的小宣道士。效果非常好。许多士兵因此得到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得到的福音书。

在苏联军营中传福音

我们不单向苏联士兵进行个人布道。我们有时也做小组工作。

苏联人很喜欢手表，见表即抢。在路上他们会截住行人，索取手表。我们常看到苏联士兵的双臂都戴着好几只手表。一些苏联女军官竟把闹钟当项链挂在颈项上。他们从未戴过手表，所以绝不会嫌太多。罗马尼亚人如果要拥有手表，就必须到苏联军营里去购买，很多时候他们买到的就是之前自己被抢走的手表。于是罗马尼亚人进入苏联军营成了常事。地下教会要找苏联人就有一个很好的借口：买手表。

我第一次进入苏联军营传福音是在一个东正教的节日，圣保罗和圣彼得日。我进入军营佯装买手表。我嫌一只太贵、一只太小、另一只又太大。几个士兵就围着我，每个人都有手表要卖。我笑着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有谁名叫保罗或彼得？”果然有人回应。我就说：“你们知道吗，今天正是你们东正教庆祝圣保罗和圣彼得的日子？”（一些年长的苏联人晓得。）于是我就说：“你们知道保罗和彼得是谁吗？”没有人知道。我就开始告诉他们有关保罗和彼得。一个年长的士兵插嘴说：

“你不是来买手表的！你来是为了告诉我们与信仰有关的事。坐下来告诉我们！但要非常小心！我们知道必须提防谁，目前在这里的都是好人。每当我把手放在你的膝盖上时，你就必须只谈手表。等我把手拿开，你才可以继续传讲你的信仰。”

相当多人就围着我。我就谈及保罗和彼得，并他们为之献身的主耶稣。好几次有些可疑的人加入圈子里，那老兵就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就只谈手表。直到那人离开了，我就又继续谈福音。在苏联基督徒士兵的帮助下，像这样的集会进行了许多次，许多同志得着基督，数千本福音书得以秘密地分发出去。

我们地下教会的好些弟兄姐妹因此被捕，被打得死去活来，但他们都没有出卖我们的组织。

在这工作中，我们惊喜地遇到苏联地下教会的成员，得以听到他们的经验。我们看到他们是如何成圣的。他们经历了多年的共产主义洗脑，有些甚至进过共产党的大学（中央党校）。但就如生活在海水中的鱼，其肉依然鲜甜，不带咸味；又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他们的灵魂也依然清净洁白。

这些苏联基督徒有那么美丽的灵魂！他们伤感地说，“我们晓得自己帽子上戴的锤镰星，正是敌基督的星。”他们极大地帮助我们向其他苏联士兵传福音。

我可以说他们拥有基督徒的一切美德，只少了喜乐。他们只在悔改的日子喜乐；不久就不再欢喜。我为此思考良久。于是有一次，我就问一位浸信会信徒：“为什么你没有喜乐？”他回答说，“我怎能快乐？我不能让自己的牧师知道我是真信徒，又不能让他知道我时常祷告、还向人传福音，因为那牧师正是秘密警察的内线。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被监

视、被出卖，而监视、出卖我们群羊的正是羊群的牧者。我们的内心深处有救恩的喜乐，你们能表露出的外在喜乐，我们却不能表露出来。”

基督教对我们就如游乐场的过山车。你们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得着一个灵魂后，就得着一个会员进入安全的教会。可是当我们这些生活在被奴役国家的信徒得着一人，就知道他可能下牢，他的孩子们可能成为孤儿。带领一个人归主的喜乐，总是掺着这种必须付出某些代价的感觉。我们遇到的是一种全新的基督徒；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在这里，我们有很多的惊喜。

就如许多人误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其实却不是；苏联也有许多人肯定自己是无神论者，其实却不是。

我曾在火车上遇到一位苏联军官。我才向他说了几分钟有关于基督的事，他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无神的论证。他引述马克思、斯大林、伏尔泰、达尔文，并其他人的话反对圣经。他不给我任何反驳的机会。他讲了将近一个小时，就是为了要说服我没有神。当他说完后，我问他：“如果没有神，怎么当你遭难时，却会祷告？”就如一个正在行窃的小偷忽然被人逮住，他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祷告？”我不让他逃脱。“是我先问你的，为什么祷告？请回答！”他低头承认说：

“在前线，当我们被德军围困时，我们都祷告！我们不晓得如何祷告，就呼叫，‘神与母亲的灵！’”（在察看人心的神眼中这一定是非常好的祷告。）

我遇到一对苏联夫妇，都是雕刻师。当我告诉他们有关于神的事时，他们的回答是：“不，神不存在。我们是布尔什维克——无神论者。但我们可以告诉你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趣事。

“有一次我们雕刻斯大林的石像。正工作中，我太太忽然问我，‘你如何看我们的拇指？如果我们的拇指与脚趾一样（五个脚趾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不是指向与其他四个手指不同的方向，我们就拿不住锤子、木槌、工具、书本、或是一片面包。少了这小小的一只拇指，人类就几乎无法生活。那么，是谁造了拇指？我们俩在学校读马克思主义，晓得天地自然存在，不是神造的。我也这样相信。但如果神没有创造天地，而仅仅造了这一只拇指，为了这件小事，祂已经值得称颂了。

“‘我们称颂爱迪生、贝尔、史蒂芬生，因为他们发明了电灯泡、电话、火车等物。为什么我们不也称颂那个造拇指的？爱迪生如果没有拇指，能发明什么？我们实在也应当敬拜那个造拇指的神。’”

那位丈夫当然生气，就如任何一位丈夫，在太太发表高见时，肯定会生气一样。“别说蠢话！你晓得没有神。你不知道房子里是否装有窃听器。我们会惹上麻烦的。现在你就必须下定决心，说没有神。在天上只有‘无人’！”

那太太回答说：“这更是奇怪了。如果天上有一个全能的神，就如我们愚昧的祖先所相信的那样，那么我们有拇指并不稀奇。因为全能的神可以造任何东西，当然可以造拇指。但天上若只有‘无人’，那么我就全心敬拜那个能造拇指的‘无人’！”

于是他们俩就成了‘无人’的信徒！他们对这‘无人’的信心，与日俱增。他们渐渐相信，这‘无人’不单造了拇指，也造了星星、花朵、孩童、并生命中一切美丽的事物。他们就如当初使徒保罗遇到的雅典人，敬拜未知之神（使徒行传 17 章 23 节）一般。

这对夫妇听到我说及在天上真的有一个‘无人’——神，也是圣灵——时，他们快乐得无以形容。这‘无人’神是个灵，充满慈爱、智慧、真理、和权力，又如此爱他们，甚至差遣祂的爱子到世上，为他们舍命在十架。

他们听见福音之前，已经是信徒。我只是带他们再进一步，叫他们经历救恩与救赎。

又有一次，我看见一位苏联女军官走在街上。我上前向她说：“对不起，我晓得不应该贸然向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性说话。可我是一个牧师，我的动机是真诚的。我希望和你谈谈基督。”

她问我说，“你爱基督吗？”我回答道：“是的！我全心爱基督！”她就投在我的怀里，不断地吻我。对一个牧师，这是非常尴尬的场面。于是我就给她回吻，希望路人以为我们是亲属。她对我说，“我也爱基督！”我带她到我家后，惊讶地发现，她完全不晓得任何有关于基督的事——绝对的一无所知——她只知道这名字，但她却爱祂。她不知道基督是救主，也不知道救恩是什么。她不晓得基督曾经活在哪里，也不晓得祂怎样死亡。她不知道祂的教训、祂的生活、祂的事工。对我

来说，她是个心理学上的奇特现象：如果你只知道一个人的名字，你怎么能爱上他呢？

她向我解释道，“在我小时候，人们教我看图识字。A 代表苹果 (Apple)；B 代表铃 (Bell)；C 代表猫 (Cat) 等。

“当我进入高中，他们教导我说，我的神圣任务就是为共产主义祖国奋斗；又要维护共产主义的道德。但我不晓得什么叫‘神圣任务’，什么是‘道德’。我必须看一个图画。我晓得我的老家有一幅人像，代表至善至美的事物。我祖母总是向这图像敬拜。她说这人是基督。我就爱上这个名字。这名字对我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以至于只要说这名，我就心中欢喜。”

听见她的话，我就想起腓利比书 2 章 10 节说，万膝要因耶稣的名而跪拜。也许那将到世上来的敌基督可以暂时涂灭神的知识。但基督的名本身就有能力，可以光照人。

她在我家里欢乐地找到基督。如今她所爱的真基督活在她的心里了。

我遇到的每一个苏联人都如一首诗歌。一位姐妹在火车站传福音，她把我家的地址给了一位有心寻道的军官。一个黄昏，这军官来了。他是一位高大英俊的苏军中尉。

我问他：“我可以帮你什么？”

他回答：“我来寻求亮光。”

我就开始向他阅读圣经里最重要的部分。他把手放在我身上，说，“我从心底里恳求你，不要误导我。我属于一种被囚在黑暗中的百姓。求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神的话吗？”我向他保证肯定是。他听了几个小时后，就接受了基督。

苏联人对宗教决不马虎。不论他们是支持宗教，或是反对宗教，总是全心投入。这就是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苏联，每个基督徒都是赢取灵魂的宣教士。历史上的苏联人也是有宗教的人民。他们是成熟的庄稼，可以结满福音的果实。如果我们努力把福音带给他们，世界的局势将会改变。可惜世界的宣教事工几乎完全遗忘了极其渴慕神话语的苏联人民，这真是个悲剧。

我们向苏联人的传道大有果效。

我记得毕欧德 (Piotr)。没有人知道他消失在苏联的哪一个监狱。他还那么年轻，大概只有二十岁。他随同苏军来到罗马尼亚。他参加我们的地下聚会，悔改、受洗。洗礼后我问他哪一节经文给他最深的印象，以至他悔改。他说，在我们的一次秘密聚会中，他听我读到路加福音 24 章，耶稣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遇见两个门徒。当他们靠近那村时，耶稣似乎要继续走 (28 节)。毕欧德就说：“我希奇耶稣为何这样。祂肯定要和门徒同在。为什么祂似乎要继续走？”我解释说祂是出于礼貌。祂希望这两人真的要祂留下。当祂看到他们果然要求祂留下，就欣然与他们一同进屋。共产党则完全不同。他们粗暴地进入我们的心中与脑海里。他们强逼我们从早到晚都听他们。他们借着学校、电台、报纸、海报、电影、无神论会议，每一处，向你强制灌输他们的无神论，不论你喜不喜欢。耶稣却尊重我们的自由。祂只轻轻地敲我们的心门。

“耶稣的礼貌赢得了我的心，”毕欧德说。共产主义与基督的强烈反差使他信服基督。他不是唯一因着耶稣这性情而悔改的苏联人。(我虽是牧师，却从未想到这一点。)

毕欧德悔改后，多次冒险把基督教读物从罗马尼亚私运到苏联的地下教会，最后他被捕了。我最后一次听到他消息时，他还在坐牢。他是否已经死了、如今正在天上？或者他还在地上打那美好的仗？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今天在哪里。

像毕欧德一样并非仅仅得救的还有许多。我们不可以仅仅停留在拯救灵魂这一步，这只做了一半。每一个被基督拯救的灵魂必须成为得人的渔夫。这些苏联人不单成为基督徒，也成为地下教会的宣教士。他们为基督义无反顾。他们总是说，能为替他们死的基督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我们对被奴役国家的地下事工

我们第二项工作，就是向罗马尼亚人民的地下宣教服务。

起初，共产党人用诱骗的手段来争取教会领袖站在他们一边，但很快他们便撕下了面具。随后噩梦便开始了，数以千计的人被抓进牢里。

现在，为基督赢得一颗灵魂对我们来说也变成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就像苏联人长期以来所经历的那样。

例如，后来我在监牢里与一些门徒同囚。这些信徒是因我传福音而信主的。有一次我与一位弟兄一同被囚。他因为信基督而坐牢，留下妻子与六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很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我问他说：

“你会不会恨我？因我领你信基督而使你和全家落到如此悲惨的光景？”他回答道：“我不能述说我对你的感谢。你使我认识这一位奇妙的救主。其他什么东西我都不要了。”

在这个新环境下传福音并不容易。我们的人民受尽了压迫。共产党向每一个人剥夺他们的财产。他们夺走农民的土地和羊群；他们夺取理发师或裁缝的小店铺。他们不单充公资本家的财产，也伤害非常穷苦的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人入狱。我们极度贫穷。人们开始问：“慈爱的神为何让邪恶得势？”

正如最初的使徒们也很难在第一个受难日传道。当时耶稣在十架上喊道：“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这福音事工持续结果累累，证明做工的是神，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例如，耶稣告诉我们有关于穷乞丐拉撒路的故事。拉撒路被欺负，就像我们一样——害病垂危、饥肠辘辘、伤口被狗舔——但结果却有天使来，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

地下教会如何半公开活动

地下教会在家里、树林、地下室，并任何能聚会的地方秘密聚会。与其他被奴役的国家一样，罗马尼亚地下教会只有一部分在地下。就像冰山，会有一个小角露出水面；地下教会也有一小部分的操作是公开的。比如，在共产党眼皮底下，我们制定街头布道的计划，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可那也是唯一能够拯救一些灵魂的地方。我的太太在这方面非常活跃。首先是几个基督徒静静地在街头聚集，然后开始唱歌。人们围拢过来听这美丽的歌声。我的太太就开始布道。我们在秘密警察闻风赶来以前，就已经散会了。

一天下午，我在其他地方忙碌时，我太太在首都的马拉西 MALAXA 工厂前，向几千工人传讲神的救恩。第二天，该厂的许多工人因为反抗共产党的不公而被枪杀。他们及时听到了福音！

我们是地下教会，可是有时我们也像施洗约翰一样公开传道，向人民，也向统治者。有一次，两位基督徒弟兄冲上政府大厦前的台阶，在仅有的一点时间里向首相乔治乌·德治 (Gheorghiu Dej) 见证基督。他们促请首相停止逼迫，马上悔改归向神。首相因他们竟敢如此大胆见证神而把他们投入监牢。多年后，当这首相病重时，那两位弟兄付出重价播撒的福音种子就开始在他心中发芽生长。在那困难时刻，这首相就想起他们的话。正如圣经所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希伯来书 4 章 12 节）。”它们切开他的铁石心肠，他终于降服下来，认罪悔改，接受了救主，并开始有病中服事主。不久他就去世了。但因着当日那两位弟兄愿意付出代价，他得以归到他新找到的救主那里。这两位弟兄是当今奴役国家勇敢之基督徒的写照。

在共产党的压迫下，传福音变得越来越难。不过我们还是成功地通过了共产党的严格审查，印发了好几种基督教读物。比如，我们交给审查人员的一些小册子的首页，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的头像，书名则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审查人员以为这是共产党的书，就盖章通过。其实这些书只有头几页引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只为瞒过审查人员——其余的都是有关基督的福音。

然后我们就到共产党的大庆典中，分发这些“共产”书刊。共产党员看到马克思的相片，都竞相抢购。当他们读到第十页，发现内容都是有关神和基督时，我们已经离开好远了。

就这样，地下教会不仅在地下秘密聚会，也勇敢地在共产党的街道向共产党的官员传福音。这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也准备好了。如今的地下教会依然乐意付出这样的代价。

卧底工作

秘密警察极力逼迫地下教会，因为他们认识到教会是共产党面对的最后一道有力的抵抗。这灵里的抵抗比任何反抗还强。如果任由教会发

展，他们的无神政权就要被侵蚀。共产党就如魔鬼，知道教会对他们的直接威胁。他们晓得一个人如果相信了基督，就不会成为一个没有独立思想的、任人操纵的工具。他们晓得他们只能囚禁人的身体，却不能囚禁人的灵魂——对神的信心。所以他们极力与教会战斗。

但也有同情支持地下教会的人，有些甚至打入到共产党政府机关和秘密警察里面。

我们吩咐基督徒加入秘密警察，穿上众人最憎恨的制服，以便把秘密警察的行动透露给地下教会。一些地下教会的弟兄就这么做了。他们隐藏自己的信仰。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穿着共产党的制服，却不能透露他们真正的任务，因此遭到亲人朋友们的鄙视。但他们因为爱基督，就选择这样做了。

当我在街上被绑架，多年被关在最机密的监房里时，一名基督徒医生就成为秘密警察的成员，只为找出我的下落！他作为秘密警察的医生，就能进出所有的监房，希望能找到我。他的朋友们都回避他，以为他成了共产党员。对他来说，穿着刑吏的制服四处走动，比穿着囚犯的衣服要付出更大的牺牲。

这位医生终于在一个黑暗的地下牢狱里找到了我，就向外界透露我还活着。他是我下狱八年半后，首先发现我下落的朋友！正因为 he 透露的这消息，1956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Eisenhower)和赫鲁晓夫

(Khrushchev)“解冻”时期，众教会就强烈呼求释放我，我因此获得短暂的自由。如果没有这位基督徒医生为了寻找我而特意加入秘密警察，我就不可能被释放。我可能如今不是仍然在狱中就是在坟墓中了。

这些地下教会成员又利用他们秘密警察的地位，多次给我们通风报信，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在共产党国家的秘密警察中，现今仍有地下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暗暗保护并警告基督徒即将到来的危险，其中一些人甚至打入了政府的上层组织。他们暗中持守对基督的信仰，秘密地帮助我们。虽然现在他们只能暗中事奉祂，总有一天，到天家，他们就可以公开承认基督了。

然而，地下教会依然有多人被发现、遭囚禁。我们当中也有好些“犹大”们，向警方告密。共产党借着殴打、毒品、威胁、勒索，尝试找到愿意出卖弟兄们的传道人和平信徒。

第二章 “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

我从事官方和地下的双重工作，直到1948年2月29日。在那个晴朗的星期日，我走在去教堂的路上，就被秘密警察绑架了。

过去我不晓得圣经说的“偷人”是什么意思。共产党让我明白了。

有好些人就这样被绑架。当时有一辆秘密警察的箱型车忽然停在我面前，四个人跳下来，推我上车。我被关入监狱，在那里被秘密关押了八年多。在那段时间里，无人知道我是死是活。有一位秘密警察冒充出狱的囚犯，告诉我太太说，他在狱中参与了我的葬礼，害我太太伤心欲绝。

那时，各宗派被捕下狱的信徒数以千计。共产党不单逮捕牧者，也抓平信徒；凡为基督作见证的农民、男孩、女孩都被抓。那时的罗马尼亚也像其他共产国家，监狱爆满。还有，入狱就意味着酷刑。

有些酷刑太可怕。我宁可不提。如果我提起，晚上就不能成眠，因为实在太痛苦了。

在《神的地下教会》一书中，我详述了我如何在狱中经历到神。

不可言喻的酷刑

一位名叫弗罗李斯古（Florescu）的牧师，遭受热铁和刀的酷刑，又被打个半死。然后他们把成群的饿鼠从一根大管子灌入他的狱室。他必须时刻防卫自己，不能睡觉。每当他歇息，老鼠就会攻击他。

他们逼他日以继夜地站立了两个星期，要他出卖弟兄们。可是他不让步。最后他们把他的十四岁儿子带来，当着父亲的面鞭打他。他们说要打到这牧师降服。这父亲几乎崩毁。实在无法再忍受了，他向儿子哀叫：“亚历山大，我必须说出他们要的！我不能忍受你再受鞭打了！”那儿子回答说：“爸爸，不要这样。我不希望看到一位出卖神的父亲。坚持下去！如果他们杀了我，我最后的话就是‘耶稣和我的祖国！’”施刑的共产党员们大怒，扑到这孩子身上，一阵毒打，以至于监狱的墙壁上都溅满了他的鲜血。这孩子就这样被活活地打死。男孩临死时还赞美

神。目睹这一切后，我们亲爱的弗罗李斯古弟兄再也不是从前的样子了。

我们的手腕上戴着特制的手铐，里边有尖钉。如果我们完全不动，这些钉子不会伤身。可是狱中的寒冷叫我们颤抖，钉子就把我们的手腕刮破。

基督徒被倒吊在绳子上毒打，以致他们的身体在击打下来回摇摆。又有些被放在特制的四壁都结冰的‘冰箱狱室’中。我曾被抛入这样的狱室，身上只有一点衣物。狱室的医生透过一个开口观察，当他们看到囚犯快要冻死了，就发出警告，守卫就冲进来把我们带出去融化。当我们开始暖化时，马上又被送回冰室，这样不断重复——快冻死前的一两分钟被救回；然后再冻；再救——就这样没有止境地折磨我们！直到如今，有时我还不肯打开冰箱。

我们基督徒有时被关在刚够容身的木箱，没有转身的余地。然后他们就从四面把尖锐的钉子打入。我们站立不动就没事，但我们被逼站立无数个小时。当我们疲惫不堪，因疲劳而身体晃动时，钉子就刺入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移动或抽动一块肌肉——就会被那些可怕的钉子刺破。

共产党对基督徒的迫害，远超过人类所能了解。我见过共产党员折磨基督徒时，脸上露出狂喜，嘴里还大喊：“我们就是魔鬼！”

我们不是与属血肉的摔跤，却是与那空中邪恶的权势争战。我们看到共产主义不是来自人，却是来自魔鬼。这是一股灵的力量——邪恶的力量。要胜过它，必须凭着另一种更大的属灵力量，就是神的灵。

我时常问施刑者：“你们难道没有怜悯之心吗？”他们就引用列宁的话：“你煎蛋怎能不打破蛋壳？”或是，“你锯木怎能不使木屑乱飞？”我就说：“我也读过列宁的这些话。可是人不是木头。你锯木，木头不会感到痛。可是你打人，每一拳都痛；又有母亲们哀哭。”可是没用。他们是物质主义者。他们看人就如木头，如蛋壳。这种信仰导致他们极端的残忍。

无神论者的残暴令人发指。当一个人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就没有理由被称为人类，他变得无限邪恶。共产党施刑者常说：“没有神、没有来生、没有赏罚。我们完全可以任意而行。”我听过一个施刑

者甚至说：“我感谢那个我不信的神。他让我活到如今，叫我可以尽情发泄心中的邪恶。”他对待囚犯手段残忍，简直叫人难以置信。

看到鳄鱼吃人，我会伤感，但我不能责备那鳄鱼，因为鳄鱼没有道德观念。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责备共产党员。共产主义已经消灭了他们里面的一切道德观念。他们夸口说自己没有怜悯之心。

我从他们学到一项功课，就是：如同他们坚决不容耶稣在他们心中；我也坚决不容撒旦存在我心中。

我曾向美国参议院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做见证说：他们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长达四天四夜。这些十字架先被平放在地上，其他数百名囚犯必须在这些被绑者的脸上和身上大小便。然后这些十字架就重新被举起。共产党员就讥笑说：“看你们的基督！多好看！祂还带来天上的芬芳！”我又提及一位神父被酷刑折磨到几近发疯，还被逼把人粪当圣饼，人尿当圣酒，分给众基督徒。这事发生在罗马尼亚的比特司提监牢（Pitesti）。我在事后问这位神父，为什么要参与共产党的这场嘲讽，而不宁可死亡。他回答说，“请不要论断我。我受的苦比基督还多！”圣经形容的地狱和但丁形容的炼狱，其中的痛苦都远不如共产监狱中的酷刑。

这些只是比特司提监狱的一个星期天里的一个小插曲。还有许多无法述说。如果说多了，我也受不了。它们实在太可怕、太淫秽了，令人无法下笔。这就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过去所遭受、并现在仍然在经历的！

如果我继续述说共产党的一切暴行，和一切基督徒的自我牺牲，我就永远说不完。但我觉得不单要使人知道这些酷刑，更应该使人知道监狱中信徒们英勇舍己的行为。以下这些在监狱中的英勇事迹曾经极大地鼓舞了暂时还是自由的弟兄姐妹们。

其中一个信心伟人是米兰·海莫维奇牧师（Milan Haimovici）。

在狱中，不时会有犯了监规的犯人叫出来鞭打。由于监狱爆满，守卫们记不得我们的名字，人与名对不上号。所以每当叫名时，不管是叫谁，米兰牧师就应声出来，代替别人挨打二十五鞭。他不单因此赢得了众囚犯的敬重，他所代表的基督也赢得了众人的尊重。

我们地下教会有一名同工是一位少女。共产党的警察发现她秘密传福音，又教导孩童有关基督的故事，就决定逮捕她。为了加剧她的痛苦，他们拖延了几个星期，直到她婚礼的那一天才逮捕她。婚礼那天，少女披上婚纱——这本是女孩子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突然，门被撞开，秘密警察们冲了进来。

这新娘看到秘密警察，就伸手让他们铐上。他们粗暴地把她铐了。她看着她的爱人，吻着手上的铁链说，“我感谢天上的新郎在我结婚之日送给我这珠宝手饰。祂看我配为祂受苦。”他们就把她拖走了，留下一群基督徒和新郎相对而泣。他们知道基督徒少女在共产党手中的遭遇。她的新郎一直忠心地等着她。五年后这少女出监——成了憔悴不堪的妇人，似乎老了三十岁。她说，为了基督，这只是她可以做的最小的事。地下教会竟有如此美丽的基督徒。

抵制洗脑

西方人听过朝鲜战争并越南战争的洗脑。我也经历过洗脑。这是最恐怖的折磨。

我们每天必须坐十七个小时，有时数周，有时几个月，甚至长达数年，听这广播：

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共产主义好！

基督教愚笨！基督教愚笨！基督教愚笨！

放弃吧！放弃吧！放弃吧！

一些基督徒问我如何才能抵抗洗脑。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洗心。”如果我们的心爱耶稣，被耶稣基督的爱清洗，就能抵抗一切酷刑。一个心中充满爱的新娘有什么不肯为她新郎做的？一位有爱心的母亲有什么不愿给她的孩子？如果你爱基督就像马利亚怀抱婴儿耶稣，就像新娘爱她新郎，那么你就能抵抗这种酷刑。

神并不在乎我们忍受多少，却在乎我们爱多少。我可以见证为信仰而受苦的基督徒真的是爱神又爱人。我就是见证人。

狱中的酷刑和虐待从来未曾中断。当我丧失知觉，或被打得神志不清以至不能提供任何口供时，他们就送我回去牢房。我躺在那里，无人

理会，半死不活，直到力气稍微恢复，他们就继续拷问。许多人就死在这种光景中。但我的力气居然总是能够恢复。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经过了好几所监狱。他们打断我四节脊背骨，并好些其他的骨头。他们又在我身上烧烙和刺开了十八个洞，刮去十多块肉。

当我和家人被赎离开罗马尼亚来到挪威时，在奥斯陆（Oslo）的挪威的医生看到我身上的伤疤，并肺部的结核疤痕，就说我如今依然存活真是奇迹。按照他们的医学书，我应该已经死了好多年了。我也知道这是个奇迹。我们的神是一个行神迹的神。

我相信神行这项神迹，是叫你们可以听到我代表共产党国家的地下教会所发的呼声。祂让我一人活着出来，为要叫我大声传达那些为主忠心受苦的弟兄们的信息。

短暂自由——而后再被捕

到了1956年，我已经坐牢八年半；体重大减，疤痕累增。我遭受拳打脚踢、饥饿压迫、拷问威胁、缺乏照顾。可这些还是不能使我供出囚禁我的人想要的。最后他们在失望中，也因为有许多人为我的被囚抗议，就释放了我。

我重新作牧师；但只维持一个星期。那时我才传了两篇道，他们就把我叫去，命令我不得再传，也不能再从事任何宗教活动。我说了什么呢？我曾劝告会友们“忍耐，忍耐，再忍耐。”“你叫他们忍耐什么？不是忍耐等候美国人来救他们吗？”警察对我咆哮着。我又说时代的巨轮不停地转动。“你正在告诉他们，共产党不能长久统治！这是反革命谎言！”他们尖叫道。如此我的公开事奉到此为止。

当局相信我会害怕他们而不敢再秘密传道了。他们估计错了。在我家庭的支持下，我暗中又开始过去的事工。

我又向隐秘的忠心信徒作见证。我们在可靠之人的掩护下，来去就如阴魂。这时我已经有身上的疤痕，可以显明无神论的邪恶，勉励动摇的灵魂信靠神，靠主刚强。我指挥一个地下的传道网，互相帮助。神遮盖了共产党的眼睛，让我们得以广传福音。如果一个人可以那么盲目，

以至不能看到神的手在做工，那么他应该也不能看到一个基督徒正在传道吧？

最后，警方对我活动和行踪的不懈关注，终于得到了回报。我又被发觉，被捕入狱。不知何故他们这次没有逮捕我的家人，可能是因为我广为人知。我已经有八年半的坐牢记录，释放了几年，如今再下牢五年半。

我第二次监禁比第一次更糟。我知道事情会这样。我的身体几乎马上崩溃。但我们地下教会继续在共产党的监狱宣传福音。

我们的协议：我们传，他们打

正如当今在被奴役的国家一样，在监牢里严禁向其他的囚犯传福音。犯规的就被毒打。我们中的一些弟兄决定为传福音的特权付代价，所以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这是一笔交易：我们传（福音），他们打（我们）。我们很高兴地传；他们很高兴地打。大家都很高兴。

以下的情况多次发生：一个弟兄向众囚犯传福音，守卫们忽然进来，把这弟兄拖去他们的“殴打室”。经过几乎是无尽头的殴打后，他们把他拖回来，丢在地上。这位弟兄满身是血，慢慢挣扎着起来，整顿衣服问：“弟兄们，方才我说道哪里了？”于是又继续传福音。

我已经看到了何等美丽的图画！

有时传福音的是平信徒。这些简朴的人得到圣灵光照后，常会传达美丽的信息。他们全心投入自己的信息中，因为在这光景下传福音，不是闹着玩的。守卫们会忽然进来，把他们拖出去打个半死。

在各尔拉（Gherla）监狱，一位名叫格利古（Greco）的基督徒被判的刑罚是——殴打至死。这过程长达数周。他被慢慢地打。他的脚底被胶棍殴打一下，狱卒就离开。几分钟之后他们再来棒打他一下，数分钟后再一下。他的睾丸也被打。一个医生给他一剂药物，让他得以恢复，又给他很好的食物，增加他的体力；然后再打，直到他死在这种不断的殴打中。当时主导这种折磨的是一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叫雷克（Reck）。

在那期间，这位中委雷克对格利古说：“你要晓得，我便是神。你的生死在我手中，不在那天上之神的手中。一切都取决于我。我要你活，你就活；我要你完蛋，你就完蛋。我才是神！”他就是这样嘲讽基督徒。

格利古弟兄在这可怕的光景中，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回答。这是后来雷克亲口告诉我的。格利古说：“你不知道你说的非常有意义。每一条毛虫，如果得到合适的生存条件，都会变成蝴蝶。你的受造不是为了作一名刽子手，却是为了成为神一般的人，有神在你心中。许多像你一样的凶手，就如保罗，都发现作一个暴徒是可耻的。他们发现他们可以做更好的事。于是他们就有着神圣的性情。耶稣对当时的犹太人说：‘你们是神。’雷克先生，请相信我，你受造是为了像神一样——有神的性情，而不是成为一个酷刑者。”

当时雷克并不理会这囚徒的话，就如大数的扫罗不在乎在他面前被打死的司提反。可是后来这些话在他的心中做工。雷克明白这是他的真使命。

共产党的一切酷刑，殴打，和屠杀教给我们一项重要功课，就是：灵是肉身的主人。我们可以感觉到肉身被酷刑，但有时这酷刑好像很遥远。我们的灵已经消失在基督的荣耀中，与基督同在。

当我们的粮食每天只有一碗污汤，每周一片面包时，我们决定继续奉献十分之一。每第十个星期我们就把这片面包给那些身体比较软弱的弟兄，当作是献给耶稣。

有一位基督徒被判死刑。他们行刑前，允许他会见太太。他对太太最后的话是，“你必须知道，我虽然死了，但我还是爱那些杀我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对你最后的要求是，爱他们！不要因他们杀了你所爱的而心中有苦毒。我们在天上再见。”这些话给一位当时在场的秘密警察的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这名官员也成了一个基督徒，并因此坐牢。这故事就是他在牢中告诉我的。

在提古奥纳（Tirgu-Ocna）监牢有一个非常年轻的囚犯，名叫马治维西（Matchevici）。他十八岁就入狱。由于酷刑，他患上肺结核。他家人听到他的状况，就送来一百瓶特效药链霉素。监牢的政治官就召见马治维西，对他说，“这是可以救你命的特效药。可是监规不许你接受家

属送来的任何物品。我个人却想帮你。你还年轻，我不想你死在牢中。可是你也必须帮我一把。你必须给我提供一些针对其他囚犯的情报，我才能向上司解释为何我特别通融你。”

马治维西回答道，“我不想苟且偷生，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成为出卖者的嘴脸。我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我宁愿死。”那位秘密警察的官员立刻与马治维西握手，说，“非常好！我也猜想你会这样回答。但我有另一个提议。一些囚犯成了我们的线人（告密者）。他们说自己如今全心相信共产主义，所以也是共产党员了。他们时常背后毁谤你。他们是两头蛇，叫人难以信任。我想知道他们的话有多可靠。对你来说，他们是出卖者，给你极大的伤害。我明白你不能出卖弟兄，但这些都是出卖者。只要你给我们一些有关这种人的消息，你就可以救自己。”马治维西立刻回答说：“我是基督的门徒。基督耶稣教我爱敌人。我不能以恶报恶。我不能给你任何有关他们的坏报告。我怜悯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不想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马治维西不久后就死在我的囚室里。我看着他死——他临终还歌颂神。爱征服了求生的本能。

如果一个穷人酷爱音乐，他会拿最后的一块钱去买演奏会的门票。听完了演奏后，他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了。可是他却不后悔：因为听到了美妙的音乐。我也不后悔在监牢中丧失的时光，因为看到了美好的事物。我不过是监狱里的一个软弱弟兄，但却有幸与伟大的圣徒和信心的英雄同室。这些人就像早期的基督徒一样，乐意为基督而死。这些圣徒与信仰英雄所展现的属灵之美，是人类语言无法描述的。

我这里说的只是平常的例子。在地下教会里，不平凡的事迹司空见惯，已如平常。地下教会是恢复到起初之爱心的教会。

入狱之前，我非常爱基督。在狱中，在见到了基督之新妇（祂的灵体）的真貌之后，我必须说我爱这地下教会就如爱基督祂自己。我看到这基督新妇的美丽，和她那自我牺牲的灵。

我妻子与儿子怎么了？

我初次被捕后，不晓得妻子怎么了。多年后我才听到她也被捕下监。基督徒妇女在监牢受的，比弟兄更苦。少女们被残酷的守卫强暴。

那种褻渎与污秽难以形容。妇女们被逼做苦工、挖运河，她们的工作量，与男人相等。她们在冬天挖泥。共产党叫娼妓当工头，这些娼妓竞相折磨忠心的信徒。我太太曾吃草如牛，只为生存。饥饿的囚犯们抓运河中的蛇与鼠来吃。守卫们在星期日的娱乐之一，就是把妇女们丢下多瑙河，然后又把她们拉上来，嘲笑他们，讥笑她们湿漉漉的身体，再丢下河。我妻子也这样被她们玩弄。

我的儿子在父母都被逮捕后，就流浪街头。米海自小就非常虔诚，对信仰非常认真。他九岁时父母下牢，信心大受打击。他心中苦涩，开始疑问他所信的宗教。他面对一般孩子在这年龄不会遇到的问题。他必须设法自己找吃的。

帮助基督徒囚犯的家人是一种大罪。两位女士因为援助米海，就被逮捕遭毒打，终身跛足。另一个妇女因为让米海住进她的家，就坐牢八年，罪名是帮助囚犯的家属。她所有的牙齿都被踢掉，骨头也被打断，终身跛足，不能工作。

“米海，信耶稣！”

十一岁时，米海就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得以维生。苦难曾动摇他的信心。在我太太被监禁两年后，米海获许探监。他去到共产党的监狱，看到在铁窗后面的母亲，又脏又瘦，双手满了老茧，身上穿着破旧的囚衣，以至他几乎都认不出她来。她的第一句话就是：“米海，信耶稣！”守卫们大发怒，马上把她拖走。米海哭着看到母亲被拖走。这一分钟决定了他的信仰。他知道如果在这情况下，一个人还可以爱基督，那么这基督肯定是救主。后来他说：“如果基督教没有其他支持它的理由，仅仅因为我母亲相信它，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这是米海真正接受基督的一日。

在学校，米海必须不断为生存而战。他是一位好学生，于是获得一条红领巾——成为共产主义少先队员的标志。我儿子说：“我绝不会佩带这红领巾，因为共产党把我的父母关在监牢。”他因此被开除。一年后他再度入学，这次他隐瞒父母亲的身份，不让人知道他是基督徒囚犯的儿子。

后来他必须写一篇反对圣经的论文。他就写道，“反对圣经的论点薄弱，引用圣经的话也不真实。那位教授肯定没有读过圣经。圣经与科学其实没有冲突。”于是他再度被开除，这次失学长达两年之久。

最后他获得进入神学院学习。但这里教的是“马克思主义神学”。每一件事物都按照马克思的思想，加以解释。米海公开异议，同学们也都支持他；于是他又被开除，不能完成神学学业。

有一次，一位教授演讲无神论；我儿子站起来反驳教授，质问那教授误导这么多青年，该当怎样的责任。全班都支持我的孩子。在这种场合，必须有一人敢发问，其他人方能响应。为了得到教育，米海必须隐藏自己是基督徒囚犯魏恩波的儿子。但不久总是被发觉，于是又被叫到校长办公室，又被开除。

米海也大受饥饿之苦。共产国家基督徒囚犯的家人都挨饿，几乎要死；帮助他们便是滔天大罪。

我告诉你一个我所熟悉的基督徒家庭受苦的例子。一位弟兄因为地下教会的活动，被捕入狱，留下太太和六个孩子。他的长女十九岁，次女十七岁，都无法得到工作。共产国家的唯一雇主就是党方。他们不给基督徒囚犯的孩子任何职业。请不要按照道德的标准来审判这事，只接受这个事实：这两位基督徒少女，为了养育年幼的弟妹和生病的母亲，就成为妓女。他们十四岁的弟弟看到这事，就发疯了，被送去精神病院。当那父亲多年后释放回来，他的唯一祷告就是，“神哪，让我再回监牢去。我实在无法忍受看到这样的事。”他的祷告获得应允，他因为向孩童传福音而再度坐牢。他的女儿们也不再从事淫业，获得了工作，条件是：接受秘密警察的要求——成为警方的线人。由于她们是殉道者的女儿，每个家庭都尊敬接受她们。她们就把听到的一切向秘密警察报告。不要说这事丑恶和不道德——它当然丑恶——可是也要自问，是不是因为你的罪（因为你这自由人没有帮助这些基督徒家庭，以至他们孤单无援），所以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第三章 被赎获释，到西方工作

我在监牢里一共度过十四年。那些年间，我不能读到圣经或任何书籍。我已经忘了如何书写。由于极端的饥饿，酷刑与药物，我连圣经的经文也忘光了。可是在我坐监满了十四年的那一天，这句话就从遗忘中出现在我脑中：“雅各就为拉结服事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创世纪 29 章 20 节）”不久，我国进行大赦，我获释了，这该归功于美国的公众舆论。

我重见妻子。她忠心等了十四年。我们在极端贫困中开始我们的新生活。因为在我国，被逮捕的人原来所拥有的一切物品都被充公了。

出狱的牧师神甫可以获得牧养一个小教会。他们分发了欧索瓦城（Orsova）的一个教会给我。共产党的异端部门告诉我说，这所教会拥有三十五名会员，我不得使它变成三十六名！他们又说，我必须成为他们的线人，向秘密警察报告每一个会员的状况，同时也不得接触年青人。共产党就是这样利用教会作为他们控制人的工具。

我知道如果我传道，就会有许多人来听。于是我完全不尝试在官方教会讲道。我重新从事地下教会工作，分担其中的美好与风险。

在我入狱年间，神奇地工作。地下教会不再被抛弃或遗忘。西方教会开始帮助我们，也为我们祷告。

一天下午，我在某省城的一个弟兄家里休息。他唤醒我说，“国外的弟兄来了。”西方基督徒没有忘记或抛弃我们。平信徒已经开始秘密援助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又暗中送来基督教的读物。

我在隔壁房间就见到六位这样的外国的弟兄。我们谈了好久后，他们才对我说，听说在这里住着一位曾经坐牢十四年的弟兄，他们想要见他。我回答我便是那弟兄。他们说：“不是吧？我们应该会见到一个愁眉苦脸的人，而不会是一个兴高采烈像你一般的人。”我向他们保证这人确实就是我。我喜乐是因为知道他们的到来以及我们不再被遗忘。从那时开始，地下教会就得到稳定的帮助。我们秘密获得许多圣经、基督徒读物、和给殉道者家人的救济。地下教会的工作得以更有效地开展。

他们不单带来神的话，也给我们看到他们的爱心和带给我们的安慰。在洗脑年间，我们不断地听到“再也没有人爱你，再也没有人爱你，再也没有人爱你。”如今我们看到英、美基督徒冒着生命危险前来帮助我们，这足以证明他们爱我们。后来，我们也帮助他们发展秘密工作的技巧——他们可以潜入被秘密警察包围的房屋而不被警察发觉。

偷运进来的圣经的价值，不是英、美基督徒所能明白的。因为在英美圣经多如牛毛，人们不知道珍惜。

如果没有外国基督徒的物质援助和祷告，我的家庭和我就不可能生存。许多共产国家的地下教会的牧师与殉道者也是这样。我自己的经历见证了自由世界给与我们的支持，不单是物质的，更是精神上的。他们就如神差来的天使！

由于地下教会重新活跃，我大有可能第三次被捕。这时两个基督徒机构——挪威犹太人宣道会，和希伯来基督徒联盟——为我向共产政府付款一万美元的赎金（这是一个普通政治犯赎价的五倍），使我得以离开罗马尼亚。

我为什么离开共产主义罗马尼亚

如果不是地下教会的领袖要我利用这个机会出国，成为地下教会向自由世界的呼声，我就算面对危险，也不会离开本国。他们希望我告诉你们有关他们的苦难与需求。我人虽到了西方，可是我的心还是与他们同在。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急切需要晓得地下教会的苦难与勇敢事工，我决不会离开罗马尼亚。但这是我的使命。

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秘密警察两次把我叫去。他们说已经收到我的赎金（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造成的经济危机，迫使我国开始出售公民来增加收入）。他们对我说：“你到西方，怎么传基督都可以，只是不许招惹我们！不许说一句反对我们的话！坦白对你说，如果你提及我们（如何对待地下教会），我们只须 1000 美元就能找到一个黑帮杀手把你杀了，或者把你绑架回来。”（我曾经在监牢里与东正教的主教瓦西列·列乌尔 Vasile Leul 同室，他就是从奥地利被绑架，带回罗马尼亚。他的指甲全都被拔掉。与我同监狱的也有一些是从柏林被绑架来的

罗马尼亚人。意大利和巴黎也有罗马尼亚人遭绑架的。)他们又说：“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有关你与某一位少女的桃色新闻，或偷盗财物，或一些你年轻时所犯的罪，以摧毁你的道德声誉。西方人最容易上当，尤其是美国人。”

威胁之后，他们就让我来到西方。他们对自己的洗脑很有信心。在西方有许多受过洗脑的东欧人，如今都保持缄默。其中一些以前受过共产党酷刑的人现在甚至称赞共产主义。共产党肯定我也不敢发声。

于是在1965年12月，我们全家就被允许离开罗马尼亚。

在我离开之前，我最后做的一件事便是到一位上校的坟墓，放上一束鲜花。这名上校曾下令逮捕我，给了我多年的酷刑。我这样做，是表示我要全身心投入，把我所拥有的基督的喜乐带给心灵空虚的共产党员。

我恨共产党的体制，但我爱它的人。我恨恶罪，但爱罪人。我全心爱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可以杀害基督徒，却不能消灭基督徒对他们这些凶手的爱。我对共产党员并向我施刑的人，没有一丁点儿的苦毒或怨恨。

第四章 以基督的爱，击败共产主义

犹太人中有这样一个传说，当他们的先祖过了红海，埃及追兵们却被淹没在海中时，众天使也与以色列人一同歌唱得胜的凯歌。神对天使们说：“犹太人是人，脱离了追兵，当然欢乐。但我却指望你们能更明白我的心情。埃及人不也是我造的吗？我不也爱他们吗？你们怎么不能感受到我对他们悲惨结局的悲伤呢？”

约书亚记 5 章 13 节记载：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

如果约书亚遇到的只是一个人，他的回答只能是：“我帮助你，”或“我帮助你的敌人，”或“我是中立的。”一个世人对约书亚的问题，只能这样反应。可是约书亚遇到的“那位”，却是从神而来的，于是他的回答最出乎意外、也最难理解：“不是的。”这是什么意思？

祂来自一个没有支持或反对的地方。在那里每个人和每样事都获得谅解、同情、怜悯、与爱。

在人的层面，我们必须与共产主义争战。在这个世界我们也必须反对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残酷、野蛮理想的支持者。

但基督徒不单是人，也是神的儿女。他们有属天的性情。为这缘故，在共产监狱受到酷刑不能使我憎恨他们。他们也是神所造的，我怎能恨他们？但我也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朋友意味两人一心（二人同心）。我与共产党员并不同心。他们憎恨神的名号；我却爱神。

如果有人问我，“你支持共产党，或反对共产党？”我的回答将会是复杂的。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大威胁，我完全反对它，要与它争战，直到它完全垮台。但在灵里，我正在天上与耶稣同坐，我坐在“不是的”的范围内。在那里，尽管他们犯下了所有罪行，共产党员还是可以被了解，也可以被爱。在那里，天上的活物尝试协助每个人达到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基督的样式。于是我的目标便是向共产党员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好消息带给他们。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祂爱共产党员。祂曾说祂爱每一个人，又宁可抛下九十九只公义的羊，去寻找那迷失的一

只。众使徒和一切基督教的伟大教师们都奉祂的名教导这普世之爱。圣马卡力 (Macary) 说, “如果一个人热爱所有的人, 只是不能爱其中的一位, 那么这人就不是基督徒, 因为他的爱并不包括所有的人。” 圣奥古斯丁教导说, “如果所有的人都公义, 只有一个罪人, 那么基督也会来承受同样的十字架, 只为救那人。祂是那样地爱每一个人。” 基督徒的教训十分清楚。共产党员也是人, 基督也爱他们。每一个与基督同样性情的人也爱他们。我们爱罪人, 虽然我们恨恶罪。

我们晓得基督爱共产党员, 因为发现我们自己也爱他们。

我曾亲眼看到在共产党监狱里的基督徒, 有的脚上绑着五十磅重的铁链; 有的身体被热铁刺入; 有的喉咙被强行灌盐, 且之后不得水喝; 有的受饥饿、遭鞭打、关冰室——却依然为共产党员热切祷告。这不是人类思想所能理解的。这是基督的爱从我们心中涌流而出。

由于党内斗争, 共产党员在对我们施以酷刑之后, 常常自己也会被关入牢房。在共产制度下, 共产党员, 包括共产党领袖, 下监是平常的事。不久前还是施刑的官员, 如今竟会成为囚犯, 与被他们殴打过的人同关一室。非基督徒囚犯们憎恨他们, 痛打这些以前的审判官。基督徒就保护他们, 甚至连自己也被打。人们还误以为这些基督徒成了共产主义的帮凶呢! 我又曾看见基督徒把自己仅有的一块面包 (那时我们每个星期仅得到一块面包) 和救命的药物都给了一个生病的前共产党施刑者、如今的囚犯。

罗马尼亚的基督徒, 前总理尤留·马纽 (Iuliu Maniu), 在共产党上台后被下监, 后来死在监狱中。他最后的话是: “如果共产党在我国倒台, 每个基督徒最神圣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去, 走上街头,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护共产党人, 使他们免于被那些自己曾经压迫过的群众的正义愤怒所伤害。”

在我悔改的最初日子里, 我感到自己活不了多久: 每逢在街上看到一人路过, 我就心如刀割, 因我不知道这人是否得救了。如果一个会友犯罪, 我会痛哭几个小时。我渴望每个人得救, 包括共产党员。

在单独牢房里, 我们不能像过去一样地祷告。我们非常饥饿; 又被药物麻醉, 几乎成了傻瓜。我们软弱如同教室里吊着的骸骨。主祷文太

长了，我们不能集中精神念完它。我唯一的祷告是重复地说，“耶稣，我爱你。”

然后，在一个荣耀的日子，我得到了耶稣的回答：“你爱我吗？如今我就向你显示我如何爱你。”顿时，我感到心中燃起一团火焰，像太阳的日冕条带般燃烧着。去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曾说，当耶稣对他们说话时，他们的心是火热的。我也如此。我认识到那在十字架上舍命者的爱。这爱包容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不论他们如何罪大恶极。

共产党员虽然一直不断地作恶，但“爱情如死之坚强，妒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众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雅歌 8 章 6, 7 节）就如阴间要吞灭一切人——不论贫富、老幼、种族、国籍、政治信仰、圣徒或匪徒——爱也是。基督是爱的化身，祂要所有人都归向祂，包括共产党员。

一个被严刑拷打的传道人被抛进我的囚室。他已半死不活，脸上和身上都流着血。我们为他清洗。一些囚犯就咒骂共产党员。这位传道人却呻吟着说：“请不要咒骂他们！请保持安静！我要为他们祷告。”

我们如何喜乐——哪怕是在监狱里

我回顾十四年的监狱生活，偶尔也有非常欢乐的时光。其他的囚犯，甚至是守卫，常惊讶基督徒为何在可怕的处境也会喜乐。我们不能被阻止歌唱，就算是因此被殴打。我想一只夜莺，就算知道自己在唱歌之后，就会被杀，它依然会唱。基督徒在牢中为欢乐而舞。他们怎么能在如此悲惨的环境中这样喜乐？

我在监中常想到耶稣对祂门徒说的话：“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路加福音 10 章 23 节）。那些门徒刚走过巴勒斯坦的土地。巴勒斯坦是个被压迫的国家，到处可见在当局暴政下的人民。他们又看到疾病、瘟疫、饥饿、忧愁。他们进入人家，只见哀哭的父母或妻子，因为爱国的壮年人都被抓去坐牢了。这可不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丽世界。

但耶稣依然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众门徒不单看到苦难，也看到了救主。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几只丑陋的、爬

行在叶子上的毛毛虫（门徒），发现自己经过一段可怜的日子后，就会变成美丽的蝴蝶，飞舞在花丛中。这种幸福也是我们的。

我四围也有不少像约伯一样的人，有一些遭受的甚至比约伯更苦。但我知道约伯在末了得着双倍的福分。我周围也有可怜的拉撒路；每天挨饿，浑身生疮。但我知道天使们会来把他们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参路加福音 16 章 20-22 节）。我看到了他们未来的样子。我今天所看见在我周围的这些破旧、肮脏、软弱的殉道者，明天就是头戴荣耀冠冕的圣徒。

我看到他们就如他们将来所是，而不是现在如何。在逼迫的人中，我也看到大数的扫罗——将来的使徒保罗。这些逼迫者，有些已经开始转变了。有些我们向他们见证基督的秘警官员已经成了基督徒；而且欢喜为基督的缘故而入狱。在鞭打我们的狱卒中，有些就如从前鞭打保罗的腓利比狱卒。我们梦想有一日他们会问：“我当怎么行，才能得救？”那些把基督徒绑在十字架上，又用人粪涂抹，加以嘲笑的；我们看到他们可能就如各各他山上嘲笑基督的人群，不久就为他们的罪捶胸悔改。

我们在监狱里看到共产党员得救的希望。也是在牢中我们才认识到自己对他们的责任。我们是在被他们酷刑后，才晓得要爱他们。

我许多亲属被共产党员杀死。可是这些凶手们后来就在我家中（一个最合适的地方）悔改。所以，在共产党监狱里基督徒就有了向共产党员传道的使命。

神看事物，不同我们；就如我们看事物，有异于一只蚂蚁。从人的角度看，被绑在十字架上，全身洒满排泄物，真是悲惨极了。但圣经却说这是“轻的折磨”。对我们来说，关在监狱十四年是很长的一段时期。但圣经却说这不过是“转眼之间”，并告诉我们“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 4 章 17 节）。我们可以这样假设，共产党的罪行，在人眼中，是不可原谅的，但在神看来不过是轻微的。他们的暴政，虽然已经长达整个世纪，但在视千年如一日的看来不过是短暂的误入歧途。共产党员还有得救的可能。

天门并没有对共产党员关闭。天光也没有向他们熄灭。他们可以像任何人一样悔改。我们必须唤醒他们。

只有爱能改变共产党员和恐怖分子（这爱有别于非基督徒的哲学家，和许多所谓的教会领袖）。憎恨使人盲目。希特勒的反共是出于憎恨。于是他不但没能征服共产党，倒促使共产党吞灭了三份之一的世界。

我们在监牢里以爱心设立一个机构，专向共产党员传道。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共产党的领袖们。

一些宣道会主任似乎没有读过教会历史。挪威如何接受基督？因为他们的国王奥力（Olaf）先接受主。苏联的国王乌伊拉底米

（Vladimir）接受了福音，苏联全国就归信。匈牙利全国也跟随他们的国王圣司提反（St. Stephen）信主。波兰也是。在非洲，当部族首领归主后，全族就跟从。我们的传道会却转向一般人。这些人可能成为非常好的基督徒，却不能左右大局。

我们必须赢得统治者：不单是政治领袖，也包括经济、科学、艺术的要人。他们塑造人类的灵魂。得着他们，就得着他们影响的众人。

从宣教的角度看，共产主义有一个特点，是民主制度没有的，就是中央集权。如果一位美国总统成为摩门教徒，美国不会通国都归信摩门教。但如果共产国家的领袖们成了基督徒，就可能得到全国。领导者的影响力就是如此之大。

共产党的领袖们可能悔改吗？肯定能，因为他们并不开心，也没有安全感，就如被他们折磨的人一般。几乎所有的苏联共产领袖都被自己的同志们监禁或枪毙。中国也一样。苏联内长雅果达（Iagoda），亿朔（Yezhov），伯利亚（Beria）等人，曾经一度权力倾城，结果也像反革命分子一样：被一枚子弹打入颈项，结束生命。几年前，苏联的内长述利宾（Shelepin），并南斯拉夫内长兰克威（Rankovic），也都像脏布一样被抛弃。

我们如何在灵里进攻共产主义

共产政权让任何人都不快乐，连获利于共产主义的党员本身也不快乐。他们害怕秘密警察的厢型车可能在任何一个晚上开到他们的府上，把他们带走——只因党方突然决定改变他们的路线！

我认识好些共产领袖，都充满压力。只有耶稣能给他们安息。

得着共产领袖归主，可能意味着拯救世界脱离核灾难，也意味着拯救世界脱离饥饿，因为当今世界把那么多资源投在昂贵的军备上。得着共产领袖，可能意味着结束国际紧张，也意味着给基督与众天使大喜乐。在宣教事工艰苦的地带，就如新几内亚或马达加斯加，如果共产领袖归主，宣教就得着全新的动力，国民就可能归信。

我认识一些悔改了的共产党员。我自己年轻时也是一个激进的无神论者。悔改了的无神论者和共产党员十分爱基督，因为他们曾经大大地犯罪。

宣教事工必须有战略思考。从救恩的角度看，每个灵魂都相等；但从宣教策略的角度，却不相同。得着一个大有影响力的人，比得着一个山林的野人更有价值。前者归主后，可以影响千万人；后者只能一人（或一家人）得着救恩。于是耶稣并不在小乡村结束自己在世的职事，却选择在世界属灵的首都耶路撒冷。为同样的缘故，保罗极力前往罗马。

圣经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蛇）的头。”（创世纪 3 章 15 节）我们却只在蛇肚上轻轻搔痒，使它哈哈大笑。今天，这毒蛇继续爬行在中国、北韩、越南、老挝。在中东仍有一些国家不允许建立任何基督教堂。教会领袖、宣教主任，并一切有思想的基督徒必须考虑解决这些被奴役国家的困境。

我们必须放弃得过且过的例行工作。“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耶利米书 48 章 10 节）教会必须在灵里给黑暗国度的执政掌权者迎头痛击。从来没有一场战争单凭防守就能取胜。要胜利，就必须进攻。

诗篇 107 章 16 节说，神“打破了铜门，砍断了铁门。”对神来说，共产党的铁幕就如同儿戏一般。

初期教会使用秘密方式、非法操作，而且得胜。我们必须效法和借鉴他们的方式。

过去我一直不能明白为何新约的许多人，不用正名，只用外号：西面又称为尼结（使徒行传 13 章 1 节），约翰又叫马可，等等。直到共产主义时代我才恍然大悟。如今，在被奴役国家做工，我们也用别名。

过去我不明白耶稣安排一个晚餐，为何不给明确的地址，却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马可福音 14 章 13 节）现在我明白了。如今地下教会也用类似的暗号来工作。

如果我们同意回到初期教会的工作模式，我们就可以在这些极权的国家中有效地工作。

但我却遇见一些西方教会领袖，他们非但不爱共产党员（若爱他们，他们早就会在共产国家成立宣教机构了），他们制定的政策反而站在共产党一边。对于马克思家中丧失的灵魂，他们也没有好撒玛利亚人拥有的怜悯之心。

人们真正相信的并不是他们在信仰宣言中所背诵的内容，而是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东西。地下教会的基督徒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我们的国际宣教网络今天仍在受压迫的国家中秘密运作。如果被发现，就可导致被监禁、被折磨、甚至死亡。我相信我所写的一切。

我有权发问：那些与共产主义交朋友的美国家教会领袖们，是否愿意为他们的信仰而死？有谁阻止他们放弃西方的高位，前往东方成为官方牧师，亲身在那里与共产党合作？至今还没有任何一个西方教会领袖证明有这样的信心。

人类语言的产生，是为了沟通和传达彼此之间的感情。但人类语言却不足以传达有关神的奥秘与属灵生命的高度。同样的，也没有人类的语言能表达魔鬼的残酷。你能描述一个快要被丢入纳粹火炉之人的感受吗？或，你能描述一个人看到自己孩子被抛进这火炉的感受吗？

于是尝试描述基督徒在共产党手下遭受的折磨，也同样不可能。

我曾经与卢克雷齐乌·帕特拉什卡努(Lucretiu Patrascanu)一同被囚。他是把罗马尼亚赤化的第一功臣。他的同志们给他的报答却是把

他抓去精神病院（虽然他完全没有精神病），与疯人关在一起，直到他也疯了，就把他投入监狱。他们对待前外交部长安娜·包克(Ana Pauker)，也是如此。基督徒也常受这种折磨。他们被电击、被强制穿上用于限制精神病人身体活动的直筒夹克 (Strait jackets)。

当世界听到红卫兵在中国街头的暴行，都大为震惊。现在试想一下在外人无法看到的中国监狱里，基督徒的光景如何。我听说一位有名的中国福音派作家和其他信徒拒绝否认自己的信仰，当局就把他们的耳朵、舌头和脚都切掉。中国监狱里现在仍然关押基督徒。

但共产党最可怕的还不是他们折磨和杀死人的肉体。他们无可救药地误导人的思想，荼毒青年与儿童。他们把自己的党员安插在教会的领导层，为要毁坏教会。他们教导青年人不要信神或基督，倒要憎恨这些名。

我们可以怎样形容这种悲剧：当一个基督徒被监禁多年后回到家里，却被自己的孩子们藐视讥笑。共产党在基督徒们坐牢时，已把他们的孩子们变成激进的无神论者。

这本书与其说是用墨水写成的，不如说是用受创伤的心所流的血写成的。

但就如但以理书所记载的：他三个年轻朋友从火炉出来后，身上没有火燎的味道；经过共产党监狱的基督徒也没有一点憎恨共产党员的味道。

如果你压碎一朵花，它就给你芬香。同样的，基督徒在被共产党员酷刑之后，就给施刑者真诚的爱。我们把许多狱卒带到基督跟前。我们只有一个愿望：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给那些折磨我们的共产党员。

我个人没有为主殉道的福气，像其他的殉道者一样。我获得释放，甚至得以离开罗马尼亚来到西方。

在西方，我发现许多教会领袖的观点与竹幕和前铁幕后的地下教会的主要观点截然相反。西方的许多基督徒对那些受压迫国家的人们毫无爱心。证据是：他们没有为这些人的救赎做任何事情。他们的传教只是为了劝说基督徒从一个教派改信另一个教派。他们没有意愿去受压迫的国家传福音，认为这样做是“违法的”。他们并不爱这些人。否则，他们

早就像威廉·凯里爱印度人、戴德生爱中国人那样，创建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宣教事工。

但是他们对受压迫国家的人们缺乏爱心，不为基督赢得他们的灵魂，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通过他们的自满、疏忽、行为（有时实质上成了共产党的同谋），一些西方教会领袖使不信神的人更加不愿意来信主。他们帮助共产主义者渗透西方教会并在世界各地的教会中篡得领导地位。他们也使基督徒对共产主义的危险毫不知情。

除了不爱共产党员，不为基督赢取受压迫国家的人们之外（西方教会的借口是共产国家不容许传福音；仿佛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是得到了尼罗皇帝的允许，方才传福音），这些西方教会领袖也不爱自己的羊群，因为不允许他们参与世界各地的属灵争战。

遗忘了的历史教训

在第一世纪，北非的基督教兴旺。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圣赛伯里昂(St. Cyprian)，圣安塔那修(St. Athanasius)和特土良(Tertullian)都来自该地。可惜北非的基督徒忽略了一个责任：向回教徒传福音。结果是回教徒征服北非，铲除当地的基督徒，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直到现在，北非还是属于穆斯林，被基督教宣道会称为“无法传道的地带”。让我们从历史吸取教训吧！

在宗教改革期间，胡斯(Huss)、路德(Luther)与加尔文(Calvin)的改教意图，与欧洲百姓希望摆脱教皇枷锁的心愿相符（那时教皇权力甚大，压迫多国的政治与经济）。如今也相仿，地下教会向极权国家的受害者传福音的心愿，正与所有自由人民希望继续在自由中生活的心愿相符。

许多极权国家拥有核武器。使用军事力量对付他们，就必引起新的世界大战，导致亿万伤亡。许多西方领袖也已经被洗脑，完全不想推翻极权统治。他们自己也常这样说。他们只希望要铲除毒品、黑帮、癌症、肺结核等，而不是罪恶的共产主义制度。他们不晓得共产主义杀的人，远超以上这一切的总和。

苏联作家伊利亚·艾伦堡(Ilya Ehrenburg)说，如果斯大林一生不做任何其他工作，只须抄一遍被他迫害的受害者的名单，他一辈子也写不完。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共产党第二十大的会中说，“斯大林清算了千千万万诚实无辜的共产党员——在一百三十九名于第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人中，有九十八人，就是百分之七十，后来被捕枪毙（被斯大林清算）。”

且想象他会怎样对待基督徒！赫鲁晓夫否决了斯大林，可是他自己却继续同样的暴行。在1959年还开放的教堂，他上台后，就再关闭其中的一半。

在中国，野蛮的浪潮比斯大林时期更甚，公开的教会生活完全中止。苏联和罗马尼亚也有新一波的逮捕。（苏联共产主义倒台后，当局向大众承认大举逮捕过苏联基督徒。）

当时的共产国家共拥有十亿人口。通过恐怖和欺骗手段，他们把整整一代年轻人培养成仇恨一切西方事物、尤其是仇恨基督教的产物。

在苏联时常可以看到当地的官员站在教堂门口监视儿童。凡到教会的儿童就被扇耳光并被撵出去。他们正在精心地、系统地培养着毁灭西方基督教的下一代！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推翻邪恶的政府：就是那以基督教国家取代异教的罗马帝国的力量；把野蛮的铁器时代的条顿人(Teutons)以及海盗时代的维京人(Vikings)变成基督徒的力量；推翻血腥的宗教裁判所的力量。这就是福音的力量，所有被压迫国家的地下教会便是它的代表。

支持这个教会并帮助她，不仅仅是与受苦弟兄团结的问题。这关系到你的国家和你的教会的生死存亡。不单单自由国家的基督徒要支持这个教会，政府的政策也应当调整。地下教会已经使共产党统治者皈依基督。罗马尼亚的首相乔治乌·德治(Gheorghiu Dej)在死前已经是一个悔改了的人。他承认自己的罪，同时不再继续自己过去的罪恶。在许多共产主义国家，都有一些政府官员是秘密的基督徒。这种现象正在蔓延。然后我们就能期待一些政府政策的真正改变——不是像(前南斯拉夫共党领导人)铁托(Tito)和(前波兰共党领导人)哥穆尔卡(Gomulka)那样的换汤不换药，仍继续着残酷无神论政党的统治——而是朝向基督教和自由的转变。

如今就有非常难得的机会。

不少共产主义的忠实信徒，（就如基督徒敬虔信基督一样）如今正面对一大危机。他们曾相信共产主义可以创造国际世界大同。如今他们却看到共产主义的东方阵营国家正在分崩离析。

他们曾经真的相信共产主义会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而不是一个乌托邦（梦幻天堂）。如今他们看到自己的人民挨饿，小麦必须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北朝鲜的饥荒就是这种情况。作为世界上最孤立的国家，北朝鲜目前正处于物资彻底崩溃的边缘。洪水摧毁了农作物，彻底破坏了他们的粮食供应。出于极度的绝望，北朝鲜不得不把窗口和大门略为打开一条缝，让世界其他国家可以稍微窥见一些被关在铁丝网后面的东西。

共产党员曾经十分相信自己的领袖。如今他们从自己的报纸读到斯大林是一个大屠杀者；赫鲁晓夫是一个傻瓜；国家英雄就如拉可西(Rakosi)、几罗(Gero)、安娜·包克(Anna Pauker)、兰可维司(Rankovici)等，也都是一文不值。共产党员不再相信他们的领袖们是绝对无误的事实。他们如今就如失落了教皇的天主教徒一样。

共产党员的心中有一个空洞。这空洞只有基督才能填满。人的内心本能地寻求神。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灵的空洞，直到被基督填满。这对于共产党员和其他被奴役的国家的人也是如此。在福音中，有一种爱的力量也可以打动他们。我曾亲眼见证它的发生，我知道这是可能的。

基督徒在被共产党员戏弄与酷刑之后，很快就遗忘并饶恕了共产党员对他们个人与家庭所造成的伤害。他们尽力帮助共产党员脱离危机，找到基督。为此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基督徒的爱并不分党派。耶稣说，神使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基督徒的爱也是如此。

西方基督徒领袖说，耶稣教我们爱敌人，于是他们就与共产党和其他极权统治者友好。但耶稣从来没有教我们只爱敌人，而忘了弟兄。

他们与那些双手沾满基督徒鲜血的人一同宴饮，而不向这些凶手们传福音，以为这便是爱。而那些被这种极权者压迫的人，则完全没人理、没人爱。

几十年前，西德福音派教会与天主教会出资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救济饥民。美国基督徒资助更多。

许多人挨饿；但我不能想象有谁比基督徒殉道者家属更饥饿。他们也最配得到自由基督徒的帮助。如果德国、英国、美国、和北欧的众教会筹集救济资金救济饥民，首先应该救济的是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属们。

可是他们得到救济了吗？

我是由两个基督徒机构买赎出来的，证明当时我国的基督徒是可以被买赎的。可是我却是罗马尼亚唯一获得西方教会买赎的基督徒。这证明西方教会忽略了许多其他当得帮助的基督徒。

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们自问，神呼召他们，是要他们单救犹太人，或也救外邦人？他们获得了正确的答案。二十世纪也出现相似的问题：基督教不是单为西方民主国家的人。基督不是仅属于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一手伸向西方，另一手向东方。祂不单祈望成为犹太人的王，也切望成为外邦人、共产党员、和西方世界的王。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马可福音 16 章 15 节）”

祂为所有的人流血，所有人都当听到这福音。

让我们在被奴役的国家传福音而深受鼓舞的是，那些成为基督徒的人充满了爱和热情。我从未遇到过一个冷淡的苏联基督徒。有年轻的前共产主义者、也有前穆斯林成为基督杰出的门徒。

基督爱这些人，愿意释放他们；就如同祂爱众罪人，愿意释放他们脱离罪。一些西方教会领袖却放弃这个唯一正确的态度，取而代之，姑息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人。他们偏袒这些罪人，帮助这些迫害者维持他们的权力，从而不但拦阻了这些人的得救，也拦阻了受他们迫害的人得到救恩。

我获得释放后，找到了什么？

我出狱与妻子团圆后，妻子问我将来的安排。我说：“我希望退隐安息。”我太太说她也希望这样。

我少年时非常激进、外向。但监狱、尤其是多年的单独囚禁，把我转变成一个默想型人物。我心中一切的风暴都止息了。我不再理会共产主义，甚至不曾察觉它。我正在天上新郎的怀抱里，为那些折磨我们的人祷告，全心爱他们。

在牢中，我几乎已经放弃任何可能被释放的希望。只是偶尔我也会想到，如果获得释放，我会作什么。我常想到我会远远离开众人，到一个沙漠去继续享受与天上新郎的甜蜜交流。

神是“真理”。圣经是“谈及那‘真理’的真理。”神学是“论及有关那‘真理’之真理的真理。”基督徒生活在这许多关于“真理”的真理中，正因如此，反而失去了“真理”本身。我们在牢中挨饿、被殴打、被下药，以至忘却了一切神学教义和圣经。我们忘了有关“真理”的众真理，于是就活在“真理”中。经上写着说：“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马太福音 24 章 44 节）在我们受刑最黑暗的时刻，我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人子就来临，照亮监狱，四壁发光如钻石。施刑的人似乎站在远处的肉体中。但在灵里，我们与主一同欢乐。这种喜乐远胜过住皇宫酒店。

我从没想过与人或事相争。我不愿意再战斗，包括为正义而战。我只愿意为基督建立灵宫。我出狱时只希望有一个平静的晚年。

但我出狱后，却看到共产主义的另一面，比我在监狱受的折磨更糟。我在各宗派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大牧师、大传道、甚至主教，忧伤地向我承认他们已经成为秘密警察的告密者，是专门针对他们自己的羊群。我问他们是否准备不计个人安危、放弃这种行为。他们都说不能。原因倒不是为了自保，却是因为如果他们拒绝告密，他们的教会就会被关闭。这是我下牢之后才开始的新变化。

每一个城市都有一名来自秘密警察的政府代表，掌控一切“异端邪教。”这人随时都有权传召任何一个牧师，查问他教会的出席名单、谁常领圣餐、谁热心信仰、谁善于赢取灵魂、人们告解（认罪）的是什么，等等。如果你不回答，你就会被赶走，另一个比你更会说话的“传道者”就替代你的位置。如果当局找不到这样的人（这种人决不难找），就关闭那教会。这也发生在今天的中国。

大多数的传道人都向秘密警察报告，所不同的只是一些人做的很勉强，总是尝试隐藏一些事物；另一些则习以为常，良心不再责备了；还有一些已经养成一种热情，把不需要报告的也说出来。

我听到基督徒殉道者的孩子们向我承认说，他们被逼向当局举报善意帮助他们的人；不然他们会被停学。

我参加一个浸信会的大会。这大会高挂着红旗；共产党在这里决定谁该成为“公选的领袖”。我晓得每一个官方教会的头头都是共产党委任的。我意识到我见到了耶稣说的“行毁坏可憎者”。

历代以来，总会有好的和不好的牧者。但中央委员会——一个无神主义政党，它的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指定教会领袖的现象，还是头一次出现。这些领袖们领导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当然了，就是帮助把宗教连根拔除。

列宁写道：“每一种宗教理念，每一种关于神的观念，甚至只是稍为想到有关神的念头，都是最危险的难以言喻的卑鄙，是最可憎的精神传染病。千千万万的罪恶、污秽、暴力、并物体的传染病，都远比对神的一种微妙而属灵的观念更安全。”

苏联的共产党都是列宁派。他们认为宗教比任何癌症、肺结核，或梅毒更为可怕。他们决定谁人可以当宗教领袖。于是官方教会的领袖，或多或少都与他们妥协。

我看到孩童与少年被无神论荼毒。官方教会没有任何消除这种属灵剧毒的对策。在我们的首都布城，你找不到一所孩童的主日学，或一个青少年团契。基督徒的孩子们都在政府办的仇恨学校里长大。

看到这一切，我才真的憎恨共产主义。（它从前折磨我，那时我并不憎恨它。）

我憎恨它并非因为它对我施加的酷行。而是因为这主义荼毒十亿活在它政权下的人民。它夺取了神的荣耀，掩盖了基督的名。

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告诉我说，如今他们在自己过去的葡萄园或菜园里挨饿——他们没有面包；孩子们没有牛奶，没有水果——因为这不再生他们的菜园，乃是集体农场了。我国的天然资源十分丰富，土地肥沃如从前的迦南地，可如今百姓却要挨饿！

弟兄们向我承认说，共产党的政权把他们逼为小偷和骗子。他们因为饥饿，就在自己过去的土地上（但现在属于集体农场了）偷瓜果。然后他们只好撒谎，掩盖自己的行为。

工人们告诉我工厂里的暴行。劳工们被大大剥削，远远超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工人没有罢工的权利。

知识分子必须违心地教导说没有神。

占当初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他们整个生命和思想都被摧毁或改造了。这事现今仍然发生在受限制的国家。

少女们抱怨说，她们因为吻了一位基督徒少年，就被召去共青团训话。然后党方给她们另一个允许她们亲嘴之人的姓名！

一切都是极其虚假和丑陋。

然后我遇到了地下教会的斗士，就是我过去的战友。他们有些至今尚未被捕；另一些是出监后，再度投入战斗的。他们呼吁我相助。我参加他们的地下聚会，他们唱的诗歌本是手抄的。

我记得伟大的圣安东尼(St. Anthony the Great)。他住沙漠三十年，远避世界，禁食祷告，静渡余生。可是当他听到圣安塔那修(St. Athanasius)与亚流(Arius)为基督的神性争辩时，他就离开了冥想式的生活，来到亚历山大城，帮助真理获胜。我记得哥利瓦的圣伯那(St. Bernard de Clairvaux)，他也是住在高山的修道士。但当他听到十字军的愚昧，并基督徒屠杀阿拉伯人、犹太人，并与自己同信仰但不同宗派的弟兄，仅仅为要争夺一个空坟墓时，他就从修道院下来，反对十字军。

我就决定做基督徒所该做的：跟从基督、保罗与众圣徒的榜样，放弃隐退之想，重新参战。这将是怎样的一种战争呢？

在监狱里的基督徒时常为敌人祷告，向他们作美好的见证。当他们得到救恩时，基督徒们就欢喜。但我憎恨邪恶的共产制度，我要坚固地下教会。靠着福音的大能，地下教会是唯一的，能够推翻可怕的暴政的力量。

我不单想到罗马尼亚，也想到整个共产世界。但在西方，我却看到冷淡的反应。

当两名共产党作家，辛尼亚夫斯基(Siniavski)和但以理(Daniel)被他们的同志们扔下监牢时，全世界作家们都群起抗议。可是当基督徒们因着信仰被判下监时，西方世界甚至连教会都不做声。

当古希克(Kuzyck)弟兄因为散布“有毒的”基督徒灵修读物与托雷(Torrey)的圣经单行本，而被逮捕入狱时，有哪个西方人理会？当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弟兄因为分发印刷的讲道被逮捕时，又有谁发声？当苏联的希伯来基督徒哥伦瓦(Grunvald)，为同样的缘故入狱，并且他年幼的儿子被共产党永久带走，又有谁抗议？我晓得当我与自己的孩子米海分离时的感受。还有像哥伦瓦弟兄(Grunvald)，伊凡奈科(Ivanenko)，谢夫丘克奶奶(Granny Shevchuk)，塔伊西亚·特卡琴科(Taisya Tkachenko)，叶卡捷琳娜·维卡齐娜(Ekaterina Vekazina)，格奥尔基·维卡津(Georgi Vekazin)，还有拉脱维亚(Latvia)的彼拉特(Pilat)夫妇等等，这些二十世纪的圣徒和信心的英雄们！我的心与他们同受苦难。我低头亲吻他们的锁链，就如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在他们的信徒同伴被抛给野兽吞吃之前，亲吻他们的锁链一样。

一些西方教会领袖们根本不关心殉道者，更不会替他们祷告。当这些人被折磨与判刑时，苏联浸信会与东正教的官方领袖们（正是他们谴责和背叛了这些殉道者）正在新德里、日内瓦和其他大会上大受西方教会的欢迎。他们在那里向每个人保证说，苏联人享有绝对的宗教自由。

在布尔什维克大主教尼古丁(Nikodim)发表这样的保证时，一位普世教会联合会的领袖就上前亲吻这主教，然后他们就在普世教会联合会的招牌下来了个大聚餐。而监牢里的圣徒们却在吃包心菜和没有清洗过的肠子，正如我以前在监牢里就是这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吃。

事情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地下教会决定如果有机会，我必须离开本国，把真相告诉西方的基督徒。

我虽然爱共产党员，但我决定反对共产主义。我要传福音就必须反对共产主义。

一些人叫我“传纯净的福音！”这叫我想起，共产党的秘密警察也曾叫我单单传基督，不要提及共产主义。那些叫我传纯净福音的，是否与共产党的秘密警察同感一灵？

我不晓得所谓的纯净福音是什么。施洗约翰传的道理纯净吗？他并不单单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3章2节）。他也责备希律“所行的一切恶事”（路加福音3章19节）。他不只谈抽象的道理，所以最终被斩首。耶稣也不单传讲“纯净”的登山宝训；祂也传了许多教会领袖所谓的否定性讲章：“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阿！…”（马太福音23章27，33节）耶稣是因为这些不纯净的讲章，所以被钉十字架。法利赛人并不会被祂的登山宝训所打扰。

我们必须称罪为罪。共产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危险的罪恶之一。每一场讲道如果不否认这主义，就不是纯净的福音。地下教会否认它，不怕因此丧失自由与生命。西方世界更不该缄默。

我反对共产主义，但却不同一般的反共人士。希特勒反共，但他自己却是个暴君。我们憎恨罪恶，却爱罪人。

为何我在西方也受苦

我在西方受的苦，多过在共产世界。

第一种苦是，我已经好久不能看到地下教会的美了。铁幕后的信徒就如古代拉丁文的格言说：Nudisnudum Christi sequi——赤裸地跟随赤裸的基督。

在被奴役的国家，人子与祂的百姓没有可以枕头的地方。基督徒在那里并不为自己建筑房屋。房屋有何用？你一旦被捕，你的房子就跟着充公了。你如果拥有一所新房，就更有可能被捕！因为其他人也想得到它！在这些国家，你要跟随耶稣，不必先回去埋葬父亲，也不必先与家人道别。谁是你的母亲，你的兄弟姐妹？正如耶稣一样，你的兄弟姐妹与母亲便是跟从神旨意的人。在那儿，人与人的天然联系几乎已经没有了。新娘控告新郎，孩子控告父母，妻子控告丈夫等，都是常事。人际关系越来越多的只存在于灵里的联系。

地下教会是一个贫穷受苦的教会，可是其中鲜有不冷不热的基督徒。

地下教会的崇拜就如一千九百年前的初期教会。传道人不懂得深奥的神学。他们就如彼得一样不懂得神学术语。任何一个神学教授都会给彼得在五旬节的讲章很低的分数。在许多国家，人们不太熟悉圣经经文，因为圣经是禁书。还有，传道人常被监禁多年，狱中没有圣经。当他们表达对天父的信靠时，这意义重大，因为在这种信靠的背后有着深刻动人的经历。他们坐牢多年，每天求全能的天父给他们面包，却得到污秽的包心菜。但他们依然相信神是慈爱的天父。他们就像约伯，即使神杀了他，他仍会相信神。他们也像耶稣，即使被钉在十字架上、似乎被遗弃时，仍然称神为“父”。

凡见过地下教会之美的，就不能满足于一些西方教会的空洞仪式。

我在西方受的苦，多于在共产监牢，因为如今我亲眼看见西方文明的没落。

奥斯瓦史班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一书里写道：

“你正在垂死中。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所有垂危的特征。我可以证明，你的巨大财富和你的极度贫穷，你的资本主义和你的社会主义，你的战争和你的革命，你的无神论和你的悲观主义，你的愤世嫉俗，你的不道德，你的破碎的婚姻关系，你的节育措施，这些正在从根基上侵蚀你，从头脑上摧毁你——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些都是古代众帝国衰亡的前兆——就像亚历山大、希腊和神经质的罗马一样。”

这是在1926年写的。从那时开始，已有半个欧洲甚至古巴失去了民主和文明。许多西方国家却还在沉睡中。

但有一股势力却没有沉睡：就是共产党。虽然在苏联与东欧的共产党对自己的主义感到失望，不再幻想；但在西方，“人本共产主义”仍然致命。西方的人文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完全不相信所有在共产国家里发生的暴行、困苦与逼迫的报道。他们以孜孜不倦的热情到处传播他们的共产主义信仰：在上层阶级的休息室，在学院的俱乐部，在大学里，在贫民区，甚至在教会里。我们基督徒对完备真理的追求经常是三心二意。他们对谎言却是全心全意。

如今西方的神学家正在讨论芝麻小事。这使我想到了，在1493年穆罕默德二世的军队围困君士坦丁堡，巴尔干半岛未来的几个世纪的命

运，面临着是归向基督教，或归向回教的关键时刻，围城里的一间教会议会却在讨论这些问题：“童贞女马利亚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天使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一只苍蝇掉在圣水里，是苍蝇成圣了，还是圣水变污了？”这可能只是当时的一个传说。但在今天基督教教会的期刊中，你却可以看到人们讨论同样的问题。而共产主义的威胁与地下教会的受苦却鲜少有人提及。

人们没完没了地讨论神学问题、仪式、并各种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一次娱乐聚会中，有人发问：“如果你遇到海难，只能从船上的图书馆里抓一本书，逃到一个荒岛上。你要拿什么书？”有人回答“圣经”，有人回答“莎士比亚”。但一位作家却正确地回答道：“我要找一本教我如何造船及抵达岸上的书。当我脱险之后，就可以从容读任何一本书了。”

保持一切宗派与神学的自由，重获因广泛的宗教迫害而失去的自由，这比坚持某些特定的神学观点更为重要。

耶稣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 8 章 32 节）。但同样的——自由，唯有自由，才能带来真理。而且，与其为无关紧要的事物争辩，不如让我们团结起来，同心为自由而战，抵挡当今世界的暴政。

我也因分担铁幕国家中教会日益加重的苦难而受苦。我经历了这苦难，如今苦难依然历历在目。

在 1966 年 6 月，苏联《消息报》(Izvestia)，和另一报纸《乡村生活》(Dervenskais Jizn)控告苏联浸信会教唆会友杀死孩子，好得赎罪。他们以前也曾用这种罪名，控告犹太人。

但我晓得这意味什么。1959 年我曾在罗马尼亚的克罗城监狱里，与一位名叫拉萨罗维奇(Lazarovici)的同牢。他被指控杀死了一位小女孩。我遇到他时，他不过三十岁，可他的头发一夜之间因为酷刑而变白，好像一个老人。他的指甲都被拔掉，为要逼他承认未曾犯的罪。一年之后，他被证实清白，得以出狱。但这时自由对他已经没有意义了，他永远是一个身心都破碎的人了。

一些人读着党报而讥笑苏联出版社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对浸信会的愚蠢的控诉。但对被控告的人，我晓得这意味什么。

身处西方，但这些图像却不断地出现在你的眼前，这真是太可怕了。

苏联卡鲁加城(Kaluga)的耶摩根大主教(Yermogen)与其他七名主教如今在哪里？他们曾抗议东正教元首亚利西(Alexei)并大主教尼可丁(Nikodim)——这两人是共产党手中的工具——积极配合苏共当局的工作。如果我没有亲眼看见几位因为抗议当局，以至死在罗马尼亚监狱的主教，我就不会关注这些神圣的苏联主教。

传道人尼古拉·埃什利曼(Nikolai Eshliman)与格列布·亚库宁(Gleb Yakumin)因为请求宗教自由，就被由共产党任命的教会领袖训诫。西方只知道这么多。但我曾在罗马尼亚的监牢与伊万神甫(Father Ioan)同囚。外界只听见这名神甫受到教会的训诫。表面上，仅仅是训诫而已。但在共产国家，官方教会领袖与警方密切合作。一位被教会领袖训诫的人，也同时会得到秘密警察更有效的“训诫”——被逮捕下牢、酷刑、殴打、强服神经药物。

我为这些在各地受逼迫的人战兢。我想到向他们施酷刑的人的永恒结局时，我也战兢。当我想到西方基督徒不帮助这些受逼迫的弟兄们时，更是战兢。

在我心深处，我深愿可以流连在自己的葡萄园，而不卷入如此巨大的斗争中。我多么希望能置身于宁静与安息之地。但这是不可能的。当共产党入侵西藏时，所有与世无争的仅仅追求纯粹精神事务的和尚都被消灭。罗马尼亚也一样。教堂和修道院被解散，只留下几间充当门面，愚弄西方人。我所渴望的那份宁静和安息，不但与现实脱节，对我的灵魂也是危险的。

我曾经带领这场战争，虽然这对我个人相当危险。他们曾在1948年在大街上绑架我，用别名把我下在牢中。那时我国外交部长安娜·包克(Ana Pauker)对瑞典的大使帕特里克·冯·罗伊特斯韦尔德爵士(Sir Patrick von Reuterswaerde)说，“啊，魏恩波吗？他目前正在哥本哈根的大街上散步呢。”可是这位大使口袋中却有一封从监牢里偷带出来的信，就是我亲手写的。他晓得安娜在撒谎。这种事还会再次发生。如果我被杀，杀手便是共产党的买凶。此外没有人要杀我。如果你们听到

有关我的道德败坏、偷盗、同性恋、婚外情、政治不可靠、或撒谎等等，便应验了秘密警察的话：“我们可以在道德上摧毁你。”

一个非常可靠的消息告诉我说，自从六十年代末我向美国参议院作证之后，罗马尼亚共产党已经决定杀我。但我不能保持沉默。你们的责任便是详细思考我说的话。就算你的结论是，我在多年监禁后，患上一种被迫害妄想症，你也该自问，这共产主义是种何等可怕的势力，能叫它的公民患上这样的病症？又是什么力量促使共产党统治下的东德居民，带着孩子，驾驶推土机冲过柏林墙，甘愿冒着全家被守卫的枪火打死的危险？

西方正在沉睡，必须被唤醒，才能看到被奴役国家的困境。

受折磨的人，为了摆脱痛苦，会寻找一个替罪羊。但我却不能。

我不能将罪责归咎于那些与仇视基督徒的人妥协的西方教会领袖。邪恶并非源自他们。这些领袖本身就是更古老邪恶的受害者。他们没有制造教会中的混乱；他们不过是在教会里发现了它。

自从我到西方，我拜访了许多神学院。在那里我听到了有关教堂挂钟的历史；崇拜诗歌的历史，已经废弃了的教规，还有已经不存在的教会的处罚。我看到神学院的老师教导学员们说，创世纪的故事不是真的；亚当的故事也是虚构的；洪水和摩西的故事也不真；圣经的预言都是在事后写的；童贞女生子是神话；耶稣复活也是神话，祂的骨头如今还在某一个坟墓中；使徒的书信也不是真的；启示录不过是一个疯人的作品。只是除此之外，圣经还是一本圣书！（如此这样的一本“圣书”看来比中共党报的谎言还要多！）

这便是今日西方教会领袖们在神学院学到的。这便是他们生活的氛围。他们何必对说这些奇怪话语的一个“教主”忠诚？既然教会说神死了，他们又何必对教会忠心？

这些人是官方教会的领袖，不是基督的新妇。他们是出卖基督的教会领袖。当他们遇到一个地下教会的成员，或一个殉道者时，就如看到一个怪物。

我们不能因着人在某一方面的态度，就论断他们。如果这样，我们就和法利赛人一样。他们眼中的耶稣是坏的，因为祂不遵守他们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其实，即使在他们眼中，耶稣也有令人喜爱的一面。但他们闭上他们的眼睛，完全忽视了。

于是，我们也不能不看这些教会领袖的其他长处。虽然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不正确，但在许多其他的事物上，他们有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也可能是真诚的，连他们目前的错失，也有改正的可能。

我曾遇到一位罗马尼亚的东正教主教。他是共产党的傀儡，出卖自己的羊群。我握着他的手，说及浪子回头的比喻。那时是黄昏，我们坐在他的园子里。我说，“你看神怎样爱一个回头的罪人。祂也乐意接受一个主教的悔改。”我对他唱了些基督教的歌曲。这人就悔改了。

我又曾与一位东正教神甫同牢。他为了获得释放，就写了好些无神论的文章。我与他谈话后，他冒着永远无法被释放的风险，把所写的都撕碎了。

我无法让任何人成为替罪羊来减轻我心中的重担。

我还有另一种痛苦。甚至我亲密的朋友也误会我。一些人说我对共产党员充满苦毒与憎恨，事实并非如此。

《摩西律法》的作者克劳底·蒙特菲奥里(Claude Montefiore)说：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态度，以及祂公开谴责他们的行为，与祂要我们爱敌人并祝福咒诅我们之人的命令相违背。伦敦圣保罗神学院的退休院长马太博士(Dr. W. R. Matthews)认为这是耶稣表现出的不连贯和矛盾之处。他给出的解释是：耶稣不是一个知识分子！

克劳底对耶稣的印象是错误的。耶稣爱法利赛人，虽然祂公开反对他们。我也爱共产党员与他们在教会中的傀儡，虽然我公开反对他们。

人们时常告诉我说：“不要提共产党，只作属灵的事！”

我曾遇到一位在纳粹手下受苦的基督徒。他对我说，只要我为基督作见证，他就全心支持我，但我不该说任何反对共产主义的话。我问他，在希特勒掌权时，一位反对纳粹德国的基督徒是不是只可以讲圣经

而不允许说任何反对独裁者希特勒的话？他的回答是，“希特勒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我们当然必须反对他！”我就回答：“共产党杀了三千万苏联人，并数百万中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他们也杀犹太人。难道只有当它迫害犹太人时我们才可以反抗，而当它杀害苏联人和中国人时就不可以？”他的回答是：“那又另当别论。”我没有得到任何解释。

我曾被希特勒时代的警察殴打，也曾被共产党的警察殴打。我看不出二者有何不同：打在身上都非常的痛。

基督教必须与各种罪恶争战，不单针对共产主义，我们不是只关心到这一个问题。但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巨大的敌人，也是最危险的。所以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反对它。

让我可以再再说一遍！人的最高目标是成为基督的样式。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这个目标。他们反宗教。他们相信人死了，就变成一堆盐和矿物质，没有其他。他们希望整个生命都生活在物质的层面上。

他们只知道群众。他们就像新约圣经中那个被问及名字的污鬼。一次耶稣问那污鬼名叫什么；那污鬼“回答说，我名叫群。”（马可福音5章9节）个性——神赐予人类的伟大礼物之一——必须被压碎。他们因为发现一个人拥有一本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的《个人心理学》而将他监禁。秘密警察的官员冲着他咆哮道：“啊，个人——总是个人！为什么不是集体？”

耶稣愿意我们拥有独立的人格，因此我们与共产主义不可能妥协。共产党也知道这个。他们的杂志《科学与宗教》(Nauka i Religia)这样写道：“宗教与共产主义不能并存。这两者是彼此为敌。共产党是对宗教的致命打击，…是要建立一个无神的社会，叫人永远脱离宗教的枷锁。”

基督教能不能与共产主义共存？共产主义的答案是，“共产党是对宗教的致命打击”。

第五章 无敌而又广泛传播的地下教会

地下教会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工作。无神论是一切共产国家的国教。他们给老年人一些信仰的自由，可是青少年与儿童是绝对不允许相信基督教的。这些国家的每一种传播媒介——电台、电视、电影院、剧院、印刷和出版机构——都被用来消灭人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地下教会只有非常有限的工具，去对抗巨大的独裁政权。苏联地下教会的传道人都未曾受过神学的训练。有些中国的牧师至今也没有机会读到一本完整的圣经。

让我告诉你，这些传道人是怎样得到按立的。我问一位年轻的苏联传道，他是如何被按立的。他回答说：“我们找不到主教为我们按立。官方主教绝不会按立一个未得到党方批准的人。于是我们十个年青的基督徒就到一个殉道主教的坟墓前。我们中间两个人按手在墓碑上，其余的人就在四周围成一圈。我们请求圣灵为我们按立。我们深信我们已经被耶稣的那双钉痕手按立了。”在我看来，这青年人在神面前的确已经被按立了！

这些被神按立，从未受过神学训练，又只晓得很少圣经的人（就如孟加拉国的传道者），正在带领传扬基督信仰的工作。

这就如初期的教会一样，当时震动世界的那一小群门徒，曾经受过神学训练吗？他们个个都识字吗？他们从哪里收到圣经？然而，神亲自向他们说话。

我们地下教会没有富丽堂皇的大教堂。但当我们在森林中秘密聚会时，有什么教堂比苍天更美？在这儿，鸟啼是我们的琴声；花香是我们的祭香；一个刚才出狱的殉道者身上穿的破衣比神甫的圣袍更令人起敬；又有天使为我们点燃圣烛，就是天上的星星和月亮。

我永远无法形容这个教会的美丽！有许多次，在秘密聚会之后，基督徒们就被逮捕入狱。在那里，他们戴着锁链，就像新娘戴着新郎赠送的珍贵珠宝那样欢喜。监狱的水是静止的，基督徒也仿佛到了可安歌的水边，得到耶稣的亲吻与拥抱。为此他们绝不肯与任何事物相交换，哪

怕是君王的位置。我只在圣经里、在地下教会中、和在监牢内找到真正喜乐的基督徒。

地下教会受到压迫，但她也有许多朋友，包括秘密警察的成员，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有时这些暗中作信徒的就秘密地保护着地下教会。

最近苏联报章投诉说“外表非信徒”的人日益加增。这些人在共产党权力机构里工作——包括政府职位，宣传部门，和其他部门。这些人外表是共产党员，其实却是地下教会的成员。

党报说及一位少妇，在共产党宣传部工作。下班之后，她与丈夫就召集住在同一公寓大楼里的其他年轻信徒，开始秘密的读经祷告会。这样的事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发生。有成千上万名这样的“外表非信徒”存在。他们感到与其参加官方教会、被人监视、听那些掺水的福音，还不如继续保持外面的权力地位与责任，静悄悄地、但却十分有效地为基督作见证。

地下教会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忠实信徒。他们在地下室、阁楼、公寓，和田野聚会。

在共产统治的前苏联，没有人记得应该是孩童洗礼还是成人洗礼的辩论、或者教皇是否无误的辩论。他们不是“前千禧年派”或“后千禧年派”。他们不能解释预言，也不为这些争辩。但却可以十分有效地向无神论者证实神的存在。

他们对无神论的回答非常简单：“如果你到一家作客，看到满桌的山珍海味，你会相信没有人烧制这些食物吗？同样，自然界便是一个为我们准备的大餐：有西红柿、桃子、苹果、牛奶、和蜂蜜。谁为人类预备了这些东西？大自然是盲目的。你若不信神，你怎么解释盲目的自然界能为我们预备所需要的这一切，而且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他们也能证实永生的存在。我听到一位信徒恳切地向一位无神论者解释说：“假使我们能够对一个在母腹里的胚胎说话，当你对这胎儿说，‘胎儿期的生命不过是暂时的，过后便是一个更长久、更真实的生命。’那胎儿会怎样回答？他大概会像你们无神论者一样（当我们向你们提及天堂和地狱时）说：‘母腹里的生命是唯一的生命，其他的都是宗教幻想。’但如果那胎儿愿意静心思想，他大概会自问：‘这两只胳膊为何

老在长？在这里我用不着它们，也难伸展双臂。那么为什么它们会长出来？是否有一个未来的世界，在那里它们可以派上用场？还有我的腿也开始生长。在这里非但无用，还必须把它们缩向胸前。那为什么要长腿？也许将来的世界广大，需要用腿到处跑动？还有我的眼睛。这里一片黑暗，要眼睛干嘛？会不会真的有一个光明多彩的世界在等着我？’

“如果这胎儿对自己本身的发育情形加以思考，那么虽然现在没有看见，他已经可以领会到母腹外面还有一个世界存在着。我们也一样。当我们年轻时，精力十足，心智却不够成熟，不知如何恰当运用它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在知识和智慧上也成长，但灵车已在等着送我们入土了。为什么我们的知识和智慧增长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却用不着呢？为什么一个胎儿会长手臂、腿和眼睛？原来，这是为了以后的生命。所以现在也是如此。我们在经验、知识和智慧上的成长是为了随后而来的服事。我们正在为死亡之后的更高层次的事奉做准备。”

至于耶稣，共产党的出版社说，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耶稣其人。地下教会的反驳也简单：“你口袋里是什么报纸，是昨天的还是今天的党报？让我看看。啊，是1964年1月4日的党报。这1964年是从何时算起？你们说耶稣从不存在，可是你们的党报为何从祂出生的年份算起？在祂来以前已经有时间了，可是人类却把祂出现的日子当作是时间的分水岭。好像祂来之前的日子尽都虚空；祂来以后人类才晓得生命的意义？你们的党报自己证明耶稣的存在不是幻想。”

西方教会的牧师常以为自己教会的成员都信服基督教的真理。其实不然。你鲜少在西方的教堂听到证实我们信仰真理的讲章。但在铁幕国家，未读过神学的信徒却能为初信的门徒提供非常扎实的信仰根基。

地下教会是基督教的信仰堡垒，但她与官方教会相互交织，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在被奴役的国家里，一些官方教会的牧师在政府施加的限制之外，秘密地在地下教会开展着平行的事工。

与共产党妥协的官方教会，由来已久。它起源于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后，一位名叫色基司(Sergius)的神甫所兴起的一个所谓的“生命教会”。他的一个合作者宣告说：“马克思主义是用无神论者的文字写的福音”。多么优美的神学啊。

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像色基司一样货色的人。

在匈牙利，天主教的巴洛神甫(Balogh)联合一些新教牧师，一同帮助共产党控制全国。

在罗马尼亚，东正教神甫布都西亚(Burducea)帮助共产党掌权。他曾是法西斯反共分子。如今为了向共产党表示痛改前非，就比红色共产党更“红”。当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Vishinski)在我国宣布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国时，这位神甫就站在那位苏联人的身边，面露嘉许的微笑，说：“这新政府要建立一个地上的乐园。从此以后，你们不再需要天上的乐园了”。

至于苏联的尼古拉(Nikolai)大主教，有记录显示他是政府的一名线人。投奔西方的苏联秘密警察德里亚宾少校(Deriabin)证实尼古拉是他们的暗探。

几乎所有的宗派都面对同样的光景。目前罗马尼亚浸信会的领导层是党方强加的，它揭发真信徒。在苏联，浸信会的领导层也是如此。罗马尼亚安息日会的主席达奇西(Tachici)告诉我说，自从共产党在国中掌权的第一日起，他就已经是秘密警察的线人了。

共产党虽然已经关闭了成千上万所教堂，但并没有关闭全部，他们特意留下一些象征性的官方教会，作为窗口，观察、控制、并最终消灭基督徒和基督教。他们保留教堂的建筑，作为共产党的工具，控制基督徒，蒙骗外国游客。这种情形如今仍然存在于中国的官方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TSPM，也称“三自教会”)。这“唯一合法”的中国教会代表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中国基督徒。

在罗马尼亚，我也曾经获得建议，成为这种特意保留之教会的牧师，条件是向秘密警察报告会友的情形。西方人习惯于“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要么全部这样，要么全部那样——无法理解这一点。但是地下教会永远不会接受那些表面的、受控制的教会作为替代品。地下教会知道自己的任务，是有意义和有效地向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每一个受造者”传福音。

但在官方教会，虽然有许多奸诈的领袖出卖羊群，信徒却依然有真实属灵的生活。(西方的教会也有类似的光景。领袖虽然败坏了，信徒却依然忠于基督。)

在苏联，虽然讲台的信息清一色地谄媚共产党，东正教的仪文依旧不变，喂养着教会成员的心灵。信义会，长老会和其他新教教派也继续使用古老的赞美诗。还有，连告密者（包括许多官方牧师）的讲道也必须包含一些圣经章节。当今中国也有人因听到这些叛徒的讲章而悔改。他们知道这些讲员是叛徒，会向秘密警察汇报他们的悔改。他们必须向那个用败坏的讲道带领他们信主的人隐藏自己的信仰。这便是神在利未记 11 章 37 节里用象征性语言描述的伟大奇迹：“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子粒上（按照摩西律法，这是不洁的），子粒仍是洁净。”

说句公道话，并不是全部官方教会的领袖，包括最高层的领袖，都是共产党的人。

也有一些地下教会的成员在官方教会里占有重要地位，虽然也有一些必须隐藏自己。这些成员尝试维持纯正的基督教，不叫它沦为一个仪式，却是可以奋斗的信仰。当秘密警察前来关闭罗马尼亚的弗拉底米若斯提修道院(Vladimireshti)、以及苏联本国的许多修道院时，他们发现阻力很大。一些共产党员因为企图禁止传播宗教信仰，甚至赔上了他们的性命。

但官方教会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我想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苏联不会超过五、六千所。（美国人口与苏联人口相近，在当时却拥有三十万所教堂。）还有，这些苏联的“教堂”，并不如我们的想象的那样。有好些不过是一间小房子。外国人看到莫斯科的大教堂充满人群，就以为这里宗教非常自由。他们欣喜地报道说，“甚至教堂都坐得满满的！”他们没想到，全城七百万灵魂却只有这一所新教教堂，这是何等的可悲！还有，那些只有一个小房间的教堂，许多在偏远的地方，不是苏联百分之八十的民众所能抵达的。我们只有两种选择：或遗忘这些民众，或使用非法的管道向他们传福音。此外别无选择。

共产主义在一国越是得势，教会就越需要转到地下。

如今，共产党就用关闭的教堂来进行反宗教的集会。

地下教会如何“吸收”无神刊物为己所用

但地下教会也晓得如何利用无神刊物作为属灵粮食，并且加以利用；就如先知以利亚从不洁净的乌鸦得饼和肉为食物一样。

无神论者们大费心机抨击圣经。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可笑的圣经》；另一本书，称为《信徒与非信徒的圣经》。为了讥笑圣经，他们就引用许多圣经章节。我们多么高兴！这数百万册的书布满了圣经章节，虽然共产党嘲笑这些经节，但它们却是不可言喻的美丽。对它们的批判是如此的愚昧以至无人理会。在过去，天主教的异教裁判所把一些真圣徒视为“异教徒”，迫使他们身穿画着地狱的火与魔鬼的各种怪衣，游街示众。但这些“异教徒”是何等神圣！如今也相仿。圣经仍然保持它的真实，即便是魔鬼引用它们。

共产党印刷局非常高兴又获得数千封的信件，要求重印这些引用圣经章节的无神论书籍。他们不晓得这些信件来自地下教会，这是地下教会获得经文的唯一途径。

我们也晓得如何善用无神论的聚会。

一位共产党教授在一个聚会里，当场示范耶稣不过是一个魔术师而已。教授在台上摆着一瓶水。他把一些粉末加在水中，水就变红。教授解释说：“这就是所谓的神迹——耶稣在祂的长袖里藏着粉末，就弄出一个水变酒的神迹。但我比耶稣更厉害。我能把酒再变回水。”于是他加入另一种粉末，红色的水又变透明了。然后他再加一种粉末，水就又变成红色。

一位基督徒站起来说：“教授同志，你变戏法的能力让我们感到惊讶。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喝一瓶你变的酒！”那教授回答道：“这个我做不到。这粉末有毒。”那位基督徒就说：“这便是你与耶稣完全不同的地方。耶稣的酒，给我们喜乐了两千年。而你的酒，却足以毒杀我们。”这位基督徒因此下牢。但这事件却大大广传，坚固了许多人的信心。

我们虽软弱像年少的大卫，却强壮胜过不信神的巨人歌利亚，因为神在我们一方，真理属于我们。

有一次，一位共产党员在一所工厂发表无神论的演讲。每一位员工都必须出席，包括基督徒员工。所有人都必须静听反对神的言论，并信耶稣的愚笨。他说没有灵界、没有神、没有基督、没有来世，人不过是物质而已，没有灵魂。他一再强调只有物质存在，说了又说。

一位基督徒起立，要求发言。得到批准后，这基督徒就提起他坐的座椅，把它摔到地上。他停顿了一会儿，看着那张椅子。然后上台朝那位讲员脸上煽了一巴掌。那讲员非常生气，满脸通红，满嘴脏话，高声呼叫共产党员同志们上来逮捕这基督徒。他责问道：“你胆敢动手打我？有什么理由？”

基督徒回答道：“你刚刚证明了自己是在撒谎。你说一切都是物质，此外无它。我把椅子摔在地上，它果然是物质，它不会生气，因它确确实实就是物质。可是我打你，你的反应却不像椅子。物质不会生气，你却会。所以说，教授同志，你错了。人不单是物质。我们也是灵体！”

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在无数这样的场合里，戳穿了无神论者的诡辩。

在监牢，一位政治官员粗暴地问我：“你要坚持愚笨的宗教到几时？”我就对他说：“我曾见过好多位无神论者在临死前懊悔自己不信神；他们呼求基督。但你可以想象一个基督徒在临死之前，懊悔自己成为基督徒，于是开始呼唤马克思或列宁来救他脱离他的信仰吗？”他开始大笑——“好聪明的回答。”我继续说：“当一个工程师建成了一座大桥，一只小猫跑过去并不证明桥身稳固。必须有一列火车行过才能证明。在凡事顺利时，你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并不证实无神论。当危机来临时，无神论就站立不住。”于是我引用列宁的书，向他证实列宁甚至在成为苏联首相后，当事不顺利时，也会急得做起祷告来。

我们心中安宁，也能安静等候事情的发展。只有共产党不能安宁，拼命发动新的反对宗教的运动。他们证实了圣奥古斯丁的话说，“一颗心除非找到你（基督），不然总不得安息。”

为什么连共产党员也能得救

地下教会若得到自由世界基督徒的帮助，就能赢得共产党员的心，从而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能赢得共产党员，因为共产主义是反人性的。狗不肯放弃口中衔着的骨头，因为这是它的天性。共产党员明知他们所相信的是荒谬的，仍然被迫相信，所以他们的内心深处反抗他们外表所必须扮演的角色。

当一位共产党员强调物质就是一切，人不过是一堆化学物质，我们死后就变回盐和矿物质时，我们只要问，“为什么各国共产党员愿意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化学物质有理想吗？矿物质会不会为了别人的好处，就自我牺牲？”他们无言以对。

还有关于残暴！人的受造，不是为了成为暴君或杀手。人不能长久残暴。就如纳粹政权垮台后，纳粹领袖有些人自杀，另一些则悔改，承认他们犯了大罪。

在共产国家有极多的人醉酒。这暴露了人们渴望拥有一个更有意义的生命，这不是共产主义所能提供的。苏联人的胸怀豁达深沉；共产主义则过于肤浅。苏联人寻求深层的生命，既找不着，就沉溺于酒海。酗酒是对生活的残酷和欺骗感到恐惧的表现。但酒精只能给人短暂的解脱，而真理——如果被知晓——将给人带来永远的自由。

当苏军占领我国期间（1947-1989。译者注：虽然苏联军队在1958年就已撤出，但在政治上，罗马尼亚仍然受苏联共产主义的影响和控制。直到1989年的罗马尼亚革命，齐奥塞斯库被逮捕，共产党政权才被推翻），有一天，一种不可名喻的力量催动我，叫我走进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一所酒馆。我带着太太一同进去。进到里面，我们就看到一位苏联军官手持手枪，威胁众人；他要添酒，酒店却不给，因为他已经醉了。人人都很害怕。我去见店老板——他认识我——请他给这上尉加酒。我向他保证我会陪同这军官，确保他不闹事。酒就一瓶瓶地送上桌。桌上有三只酒杯，上尉每次总是礼貌地盛满三杯，然后把三杯酒都喝尽。我与太太都没有喝。这上尉虽然已经大醉，脑筋却还会思想，因他是一个习惯喝酒的人。我对他说基督，没想到他竟然非常细心地听。

最后他对我说：“既然你告诉我你是谁，现在让我也告诉你我是谁：我曾是一名东正教的神父。当斯大林开始大逼迫时，我最先放弃信仰。我到各乡镇演讲说，没有神。我向众人承认说，‘我过去当神甫是欺骗你们。其他的神父们也是如此。’我的热心大得党的青睐，于是我摇身一变成了秘密警察的军官。神给我的处罚就是，我必须用我的这双手，施酷刑甚至杀死基督徒。如今我喝酒，不断地喝，要忘却我所做的，可是却忘不了。”

许多共产党员自杀了。他们最伟大的诗人叶赛宁(Essenin)和马雅可夫斯基(Maiakovski)自杀了。他们的大作家法捷耶夫(Fadeev)也是。法捷耶夫刚写完他的小说《幸福》就自尽了。这小说解释说，幸福便是无止境地为共产主义奋斗。法捷耶夫是那么地幸福，以至在写成了这部小说之后，竟吞枪自尽了——看来他的灵魂都难以承担他自己编撰的这么大的谎言。还有在沙皇时代有名的共产主义斗士，约菲(Joffe)和多马金(Tomkin)，在看到共产主义的真相后，都接受不了而自杀了。

共产党员不快乐。连他们的独裁者也不快乐。斯大林多么不快乐！在几乎杀尽了所有的老同志后，他常常害怕被人下毒，又怕自己会自杀。他有八间睡房，每一间都可以稳固地上锁，就像银行的保险箱一样坚固。没有人晓得在某一个晚上他会睡在哪一间睡房。他的食物必须由厨师在他面前尝过，然后他才敢吃。共产主义无法使任何人快乐，包括它的独裁者。共产党员需要基督。

如果我们使这些逼迫基督徒的人悔改信了主，就不但释放了被他们压迫的人民，也释放了他们自己。

地下教会代表着被奴役国家中被奴役人民的最深需求。帮助她！

地下教会的特征是在她对信仰的真诚。

一位化名为乔治的牧者在他的一本论及地下教会的书中写道：

一位苏联陆军上尉来到匈牙利的一位牧师家，要求单独会面。这上尉非常傲慢，也很在意自己作为战胜者的角色。他被引进一间小会客室，等门关上之后，他指着墙壁上挂着的十字架。

“你晓得那东西是假的，”他对牧师说。“这不过是骗局，是你们神职人员为了骗穷人，让他们被富人剥削！现在我们单独会面，你只须向我承认说，你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那位牧师微笑说，“但是，我可怜的年轻人，我真的相信。这是真的。”

“我不要你向我玩这一套！”上尉喊道。“我是当真的。不许你嘲笑我！”

说罢，他拔出左轮手枪，瞄准牧师。“除非你向我承认这是一个谎言，不然我就开枪！”

“我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这不是真的。我们的主确实确实是神的儿子。”牧师回答。

这上尉就把左轮手枪丢在地上，抱着这位神的仆人，双眼流着泪花。

“这是真的！”他喊道。“这是真的。我早就相信。只是我不能肯定有人会为此信仰而死，除非我亲自看到。哦，多谢你！你坚固了我的信心。如今我也可以为基督死了。你已经向我展示了如何为祂而死。”

我也知道其他类似的例子。当苏联人占领罗马尼亚时，两名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持枪进入一所教堂，说：“我们不信你们的宗教。凡不马上放弃信仰的就要被枪毙！放弃信仰的可以站在右边！”一些人就站到了右边，然后被命令离开教会回家去。当这些人拔脚逃走后，士兵们激动地拥抱剩下的基督徒说：“我们也是基督徒，但我们只希望与愿意为真理而死的信徒有交通。”

这些不怕死的基督徒至今仍在东南亚的共产国家为福音而战。他们不单为福音而战，也为自由而战。

许多西方基督徒在家里常会花很多时间听属世的音乐。我们罗马尼亚的信徒家里，有时也会听到大声的音乐，但这是为了掩盖地下教会传福音的事工，免得被邻舍们听到而去报告秘密警察。

地下教会偶尔遇到一位从西方来的真基督徒时，会感到多么的欢喜！

我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我却是那些无声之人的声音；他们被蒙住了嘴巴，在西方从来没有人替他们发声。以他们的名义，我请求你们

在信仰上不可马虎，在处理基督教问题时要严肃认真。我代表他们，恳求你们以祷告并实际行动帮助这些在共产国家和其他被奴役国家里忠心为主受苦的地下教会。

我们肯定能赢得共产党员。首先是，神在我们的一方。其次是，我们的信息正是人心最深处的需求。

当纳粹时代，我曾经与一些共产党员同监。他们向我承认说，当他们遇到危难时，他们也祷告。我甚至看到共产官员在临死时，口中喊道：“耶稣，耶稣！”

我们必然得胜，因为我国人民的一切文化传统都站在我们的一方。苏联人可以禁止一切现代基督徒的文章言论。可是他们却不能销毁托尔斯泰(Tolstoy)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i)的书。人们从这些书中发现基督的光。同样的，东德有歌德(Goethe)；波兰有辛凯维奇(Sienkiewicz)等等。罗马尼亚的最伟大的作家首推萨多维努(Sadoveanu)。共产党把他的著作《圣徒的生活》改名为《圣徒的传说》出版。但就是在这标题下，圣徒的榜样依然激发人心。

他们也不能排除拉斐尔(Raphael)，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等人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都说及基督。这些名家的仿制品也广受民众的欢迎。

当我对一位共产党员谈及基督时，他内心最深处的属灵需求便是我的盟友、我的帮手。他的最大难处不是如何反驳我的论点，而是他难以压制自己良心的声音，因为他的良心完全站在我这边。

我认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他们在上无神论的课之前，竟然祷告求神帮助他们上课成功！我也晓得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一些偏远的地下基督徒聚会。被党方发现后，他们就极力否认参加过地下教会的聚会。过后他们就痛哭，懊悔自己没有勇气为信仰站立。他们也是人。

当一个人得到信仰时，就算是非常原始的信心，也会发展和成长。我们肯定它会得胜——地下教会多次看到它胜了又胜。

基督爱共产党员和其他“信仰的敌人”。我们必须也必会赢得他们。凡希望满足基督心愿，得着所有人之灵魂的，就必须支持地下教会和她的工作。耶稣说：“教导万民。”祂从来没有说我们应该先得到政府的允许才可以传福音。为了对神忠心，和不辜负神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超越国界，把福音传给铁幕国家的人。

通过与当地地下教会的合作，我们就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

地下教会的组成部分

地下教会有三种成员：

第一种：是被共产党开除的前牧师传道。他们是数以千计不在福音上妥协的牧师和传道人。他们许多人为信仰被逮捕下牢，受尽折磨。但一出监狱就马上恢复他们的事工，秘密又有效地在地下教会服事。虽然共产党已经关闭他们的教堂，或另选“更可靠”的牧师取代他们。但这些前牧者们却比以前更有效地服事教会，就是在暗中服事。他们在谷仓、阁楼、地下室、夜间的干草场，或任何信徒可以秘密聚会的场所聚会。他们是活着的殉道者，冒着重新被捕和更多折磨的危险，绝不停止他们的事奉。

第二种：是地下教会庞大的具有献身精神的平信徒大军。中国占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共产中国成千上万的平信徒“未经允许”就传福音。逼迫总是产生更好的基督徒，就是见证基督，赢取灵魂的基督徒。共产党的逼迫产生的严肃献身的基督徒，是自由世界少有见过的。这些人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成为基督徒却不想赢得他们遇见的每一个灵魂。

《红星报》（苏联陆军军报）攻击苏联基督徒说：“基督的崇拜者们贪得无厌，试图勾引每一个人。”但这些基督徒的光辉生活，赢得邻里和村民的尊敬与爱戴。在任何乡镇，基督徒总是最受喜欢和爱戴的居民。当一位母亲生病，不能照顾孩子时，基督徒里做母亲的就会过来替她看顾孩子。当一个男人生病不能砍柴时，就有一位主内的弟兄来帮助他。他们活出了他们的信仰。于是当他们为基督做见证时，人们就乐意倾听而且愿意相信，因为在他们的生命中看到了基督。由于只有官方执

照的牧师可以上台讲道，于是数以万计热忱的、献身的基督徒就在共产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赢得灵魂。他们在市场里、乡村水泵旁等，每一个有人路过的地方见证基督与传讲福音。共产党的报章承认说，基督徒肉贩把福音单张夹在包肉的纸张里（传福音）。共产党的新闻又说，在共产党印刷局当高级职员的基督徒，深夜潜回，开机印刷数以千计的基督徒读物，在天亮之前就关机离去。党报又承认，莫斯科的基督徒孩子们从“某些地方”获得福音书，用手抄写。然后这些孩子们就把这些抄本放进挂在学校更衣室里老师的外衣口袋中。这些广大的平信徒是非常强大又有效的宣教力量，他们遍布每个共产主义国家。

这数百万真实的、献身的，火热的平信徒，已经被逼迫他们的烈火炼净，这火原是共产党希望用来摧毁他们的。

在共产主义的古巴，官方的普世教会委员会主要由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会领袖组成。然而，尽管政府不断骚扰，成千上万个家庭教会还是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

第三种：是大批忠心的、在官方被束缚和噤声的“教会”任职的牧师。地下教会并非全然与官方教会脱节。在许多共产国家，诸如波兰、匈牙利，和前南斯拉夫，好些官方教会的牧师们也同时秘密地在地下教会工作。当今在有些国家这两种教会仍相互交织存在。这些牧师们只准在他们狭小的官方教堂里传讲基督，离了教堂就不行。他们也不被准许开设儿童或青年聚会。非基督徒也不敢来。他们不被准许拜访生病的会友，为他们祷告。共产党制定了一大堆规条来束缚他们，以至他们的“教会”完全失去功用。

这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宗教自由”。许多时候这些牧者们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勇敢地，平行地进行远远超出政府限制的秘密事工。他们秘密服事青少年与儿童。在中东、北非，和亚洲，他们秘密在信徒的家里，并地下室里传道。他们又秘密接受与分发基督教的读物给饥渴的灵魂。他们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故意秘密地忽略官方限制，服事身边饥渴的灵魂。他们外表温顺，服从共产党，暗地里却冒死秘密传扬神的话。前苏联当局发现并逮捕了不少这样的牧师，把他们囚禁数年。

当今有越来越多的男女被抓捕。他们是受限制国家地下教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前牧者（他们被自己的教会赶出和被官方政府逼迫），教会平信徒，并一些官方教会的牧师（他们秘密地进行比他们所允许的更大更广泛的事工）——这三种成员便组成地下或“非官方”教会。这地下教会将会继续活动，直到共产主义或其他“主义”倒台。在一些地区，某一种成员比其他的成员更活跃，但这三种成员都存在，也都冒着极大的危险为基督工作。

西方有一位对宗教问题很感兴趣的人，常常到各个共产国家旅游。他回到西方时写道，他在共产国家从未遇到过什么地下教会。

这就如一位旅客，拜访了中非未开化的土人部落之后，回来说，“我深入询问了许多当地人，问他们是否说散文。他们都告诉我他们不说。”事实是，当地土人都说散文，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们说的就是散文，因为他们不懂得“说散文”是什么意思。

公元最初几十年的基督徒并不知道自己是（被后来人称为的）基督徒。如果你问他们的宗教，他们会回答说，他们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信耶稣为弥赛亚的人/弟兄/圣徒/神的孩子等。“基督徒”这名字是后来别人对他们的称呼，是从安提阿城开始的。

马丁路德的信徒并不晓得自己便是路德会员（信义会员）。路德本人强烈抗议使用这个名字。（只有中文的路德会改名为信义会；英文依然使用路德会。）

“地下教会”是一个由共产党人以及那些研究东方国家宗教动态的西方学者所赋予的名称，指的是一个在所有共产主义国家自发形成的秘密组织。地下教会的成员并不以这个名字称呼他们的组织。他们称自己为基督徒/信徒/神的儿女。但他们从事地下工作，秘密聚会，通过隐秘的聚会传播福音。有些西方国家来的人参加了这些聚会后，还不知道这就是地下教会。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既由对手赋予，也由那些从外部充满爱意地看待这个美好秘密组织的人赋予。

你可以在西方世界旅行多年，却依然未曾遇到一个国际间谍网。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间谍网不存在。没有一个间谍网会那么笨，以至会暴露给一个好奇的旅客。

在下一章我将引用几十年前苏联媒体刊登的一些文章，来证明这个勇敢的地下教会不但存在，而且其地位越来越重要。

第六章 基督教如何战胜共产主义

我已经提及我们如何在苏联军队，并在共产党统治的罗马尼亚，秘密传福音。我也已经呼吁你们，支持我们向共产党员和被他们压迫之下的人民传讲耶稣。我的挑战是“有远见”还是“不可行”？是否现实？

如今在共产亚洲与其他被奴役国，是否还有地下教会？那儿的地下工作是否还行得通？

对这些问题，我们有非常好的新闻剪贴，作为回答。

如今共产党正在庆祝超过半个世纪的共产统治。但他们的胜利其实是失败。得胜的是基督教，而不是共产主义。我们地下教会仔细研究苏联的报纸，里面充满了针对地下教会的负面宣传。苏联的地下教会那么强大，以至敢于半公开地工作，这着实令共产党丧胆。现在活着的前苏联领导人也证实了这些党报的报道。

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各地的地下教会就像冰山，大部分是藏在底下看不到的，只有一小部分公开运作。

下面就是我对他们在二十世纪所取得的一些辉煌成就所做的简要汇编。

冰山一角

1966年11月7日，高加索的苏湖米城(Suhumi)的地下教会举办一个大型露天聚会。许多其他城市的基督徒也来参加。在讲坛呼召时，有四十七名青少年接受基督。他们马上就在黑海受洗，一如圣经中使徒时代的做法。(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受洗的训导课程。)

经过几十年的共产党专制，没有圣经、基督教书籍，和神学院，地下教会的牧者们无法接受神学训练。但耶稣的门徒腓利也没有受过神学训练。当一位和他谈道大约只有一小时的太监问他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们两人“就同下水里去，腓利就给他受洗。”(使徒行传8章36-38节)

黑海的水非常充足，地下教会就恢复使徒时代的做法。如今，虽然共产党已不在苏联掌权，但基督徒在前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地区还是面临着逼迫。

《苏联教师杂志》(Uchitelskaia Gazeta)在1966年8月23日报导，说在顿河河畔的罗斯托夫城(Rostov-on-Don)，浸信会信徒进行街头示威，拒绝注册他们的教会，也不听从被共产党委任的所谓的“教会领袖们”。

示威的日子选在5月1日，劳动节。就如耶稣常常选择在安息日行神迹，违抗法利赛人；地下教会有时也会选择在共产党的大日子示威，违抗共产党的法律。5月1日是共产党的大日子，年年都要大事庆祝，每个人都被强迫参加。但这次，苏联第二大势力——地下教会——也在街头出现。

有一千五百名信徒出席。他们晓得自己正在冒着丧失自由的危险。他们也知道监牢的饥饿与酷刑在等着他们。但神的爱催促他们前来。

每个苏联信徒都晓得巴那勿(Barnaul)福音派基督徒出版的《秘密宣言》，其中提及库伦达(Kulunda)村庄的马拉姐妹(Hmara)被告知她的丈夫死在牢中。她成了寡妇，带着四个幼小的孩子。当她得到丈夫的尸体时，她看到丈夫手腕上有手铐铐过的痕迹；双手、十指、并脚板都严重烧伤；下腹刀疤累累；右脚肿胀；双脚都有被打的痕迹。总之，全身上下都布满了被毒打的痕迹。

每一个参与罗斯托夫公开示威的信徒，都晓得自己可能会遭遇同样的虐待，可是依然出席。

他们也知道马拉的丈夫才信主三个月，就为主舍了命。他下葬时有一大群信徒送殡，悼词写着：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利比书1章21节）。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马太福音10章28节）。

“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被杀之人的灵魂”（启示录6章9节）。

这殉道者的榜样激励了罗斯托夫的众人。他们围在一所小屋子四周。街上到处都是人——有些在附近的屋顶上，有些在树上——不禁让

人想到圣经里的矮子税吏撒该。那天有八十人悔改信主，多数是年青人。其中包括二十三名前共青团的团员！

此后信徒们步行，穿过市区，前往顿河为这些初信的人受洗。

不久共产党警察的几辆卡车就抵达河边，他们要逮捕带领的弟兄（因为他们不可能逮捕 1500 人！）。信徒们马上跪下恳切祷告，求神保护祂的子民，使他们能够进行当日的聚会。然后兄弟姐妹们就肩并肩站成人墙，围住带领的弟兄，希望可以阻止警察逮捕他们。情况变得非常紧急。

《苏联教师杂志》说这些罗斯托夫的“非法”浸信会（在苏联，“浸信会”一词包括五旬节派和福音派）会员拥有地下印刷机用来印刷非法刊物。这些刊物呼吁青少年为信仰站立，也建议基督徒父母做一件我认为非常好的事情：“带他们的孩子参加葬礼，使他们明白人生转瞬即逝，所以不要过于担心。”又建议父母给孩子们基督教教育，以对抗他们在学校受到的无神论毒害。

这《苏联教师杂志》在文章结尾问道：“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们那么胆小，不敢介入学生们的家庭生活，以至于他们被宗教愚弄？”

这份《苏联教师杂志》也描述了对那些秘密施洗的地下工作者的审判过程：“被传唤作证的年轻信徒们在共产主义法庭上表现得目中无人且不屈不挠。他们表现得愤怒而又狂热。年轻女性旁听者以仰慕的眼神注视着被告，同时以不满的目光看着无神论的公众。”

地下教会成员冒着被殴打和监禁的危险，在苏联共产党总部的门前请愿，要求更多的自由。

我们有一个通过秘密渠道运送到西方的材料，它来自苏联福音派浸信会教会的“非法”委员会（该委员会与由叛徒卡列夫 Karev 领导的、受共产党控制的“浸信会联盟”相对；卡列夫曾歌颂共产党对基督徒的大屠杀，渲染苏联政权下的“自由”。）

这份秘密材料提到了另一场英勇的公共示威，这次是在莫斯科。

这里是这份宣言的翻译：

紧急通知

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与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我们必须急迫地告诉你们，有五百名来自各地的福音派浸信会代表在1966年5月16日抵达莫斯科。我们到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厦，要求与中央权力机关对话。

我们交上一份请求，要求会见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这宣言又说，这五百名弟兄们整天站在大厦外。这是莫斯科首次出现的公开反共示威。他们都是地下教会的代表。天将晚时，他们交上第二份请愿书给勃列日涅夫，投诉一位共产党官员斯特罗加诺夫“同志”(Stroganov)拒绝传达他们的要求给总书记，并且威胁他们。

尽管那晚下雨，这五百名代表仍然整夜留在街头。尽管遭到言语侮辱，并被路过的汽车溅上泥浆，他们仍然坚持站在共产党大楼前，直到天亮！

第二天，党方建议这五百名弟兄们进入大厦，会见一些低级官员，但“信徒们知道，如果他们进入大厦，由于大厦里没有证人，就必被打。于是弟兄们拒绝进入，坚持要见勃列日涅夫。”

于是不可避免的事便发生了。

在下午1点45分，二十八辆军车开到，党方开始以暴力对付这些信徒。“我们手牵手围成一圈，组成人墙，开始唱诗歌，《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就是可以背负十字架的日子》。秘密警察的人员开始殴打我们，不分老少。他们拉断我们的人墙，殴打我们的脸和头，又把我们抛到柏油马路上。他们拉着弟兄们的头发，拖他们上车。凡尝试离开的，就被打到丧失知觉。后来信徒们全部被拖上车，不知被载到何处。这些弟兄姐妹们在秘密警察的军车里还唱着诗歌。这一切都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

这事以后，一件更美的事就发生了。在那五百名信徒被捕受刑后，基督羊群的真领袖乔治·文斯(G. Vins)和霍列夫(Horev)，竟然还敢跑到同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部去交涉。正如耶稣在施洗约翰被捕后，就开始在同一个地方传同样的信息，就是约翰为之受苦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马太福音4章17节）。

文斯与霍列夫要求知道被捕代表们的下落，并要求立刻释放这些代表。这两位勇敢的弟兄随即失踪，下落不明。后来听说他们被关在列福尔托沃监狱(Lefortovskaia)。

地下教会基督徒害怕了吗？不！其他的弟兄们马上冒着失去自由的危险，印刷以上的宣言，告知事情的经过。他们劝勉信徒们：“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腓利比书 1 章 29 节）。他们坚固弟兄们：“免得有人被诸般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帖撒罗尼迦前书 3 章 3 节）。他们又引用希伯来书 12 章 2 节，呼吁弟兄们定睛于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地下教会公开反对无神论对青少年的毒害，不单在罗斯托夫与莫斯科，也在全苏联。他们反抗共产主义的毒化政策和官方教会中那些阴险的领导人，他们在一份秘密宣言中写道：“在我们的时代，撒旦发号施令，而‘教会’接受所有与神诫命相悖的决定。”

《东方真理报》(Pravda Vostoka)报道了对阿列克谢·涅韦罗夫(Alexei Neverov)、鲍里斯·加尔马绍夫(Boris Garmashov)和阿克森·祖博夫(Axen Zubov)弟兄的审判。这些弟兄们安排大家聆听美国的福音广播。他们把福音信息录制下来，然后分发给众人。

他们又被指控假借“郊游”和“艺术圈”的名义，进行秘密的福音聚会。地下教会的工作，宛如初期教会在罗马的地下墓穴(catacombs)聚会一样。

1966 年 9 月 15 日的党报《苏维埃摩尔多瓦》(Sovietskaia Moldavia)也提到，地下教会油印小册子，并违法地在各个公开场所聚集，到处见证基督。

该报又说，有三名少男和四名少女，在雷尼(Reni)前往基希讷乌(Chisinau)的火车上唱基督徒圣诗“将我们的青春奉献给基督”。该文章记者承认自己感到反胃，因为这些信徒“在街上，在车站，在火车与公交车上，甚至在政府机关里，到处传福音”。这又是今日苏联地下教会活动的一个证据。

当这几位基督徒因唱基督教圣诗而在法庭上被定罪时，他们跪下说：“主阿，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感谢你，允许我们为这信

仰受苦。”一位“狂热的”马丹(Madan)就带领在法院里的观众一同唱诗，所唱的诗正是这些刚刚被判入狱和受酷刑的弟兄姐妹们所唱的。

在五月一日，科普塞格(Copceag)与扎哈罗夫卡(Zaharovka)村庄的基督徒，由于没有教堂，就在森林里秘密敬拜聚会。他们又假借生日庆祝，进行聚会。(许多基督徒家庭，虽然只有四、五名家庭成员，一年却有三十五次“生日庆祝会”用于掩盖秘密的敬拜聚会。)

没有任何监狱或酷刑可以吓唬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就如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逼迫反而加深他们的奉献精神。

1966年10月4日的党报《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ini)提到苏联地下教会的一名领袖普罗科菲耶夫(Prokofiev)弟兄。他虽然已经下牢三次，但每次出狱，就继续进行秘密主日学，于是再度被捕。他在秘密宣言里写道：“官方教会顺服人的规条(共产党的规条)，就丧失了神的祝福。”

当你听到一个弟兄下监狱时，不要以为那里的监狱类似西方的监狱。在受限制的国家，监狱意味着饥饿、酷刑，和洗脑。

1966年第9期的《科学与宗教》(Nauka i Religia)报导说，基督徒传播的福音刊物，封面是采用一种流行月刊《小火焰》(Ogoniok)(与美国的《展望》和《时代》周刊相似)做掩护。他们又赠送一些书，封面是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却是圣经的一部分。

这些基督徒也在公共场合唱基督教的歌：唱的调子是共产党的《国际歌》(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但歌词却是赞美基督(见《哈萨克斯坦真理报》(Kazakstankaia Pravda)1966年6月30日)。

基督徒在一份从西伯利亚库伦达(Kulunda)印行的秘密信件中，提及浸信会的官方领袖“摧毁教会与真信徒，就如大祭司与法利赛人把耶稣出卖给彼拉多”。但忠于信仰的地下教会仍继续工作!

基督的新妇继续事奉祂!共产党自己也承认说，地下教会赢得了共产党员归向基督。共产党员可以悔改得救!

1966年4月27日的《巴库工人报》(Bakinskii Rabochi)转载一名归主的女共青团员塔尼娅·丘古诺娃(Tania Ciugunova)之信件。这信被共产党官员没收，其中写道：

亲爱的娜蒂娅(Nadia)阿姨，愿主祝福你。娜蒂娅阿姨，主耶稣是何等的爱我！虽然我们在祂面前什么也不是。我相信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当爱你们的仇敌，诅咒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恨恶你们的要待他们好，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

当这封信被没收后，带领这少女和许多其他年轻的共产党员信主的彼得·谢列布列尼科夫(Peter Serebrennikov)弟兄也被捕入狱。党报引述彼得弟兄的一段讲章：“我们必须相信救主，就如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一样。对我们，圣经是主要的法律。我们不承认其他的法律。我们必须赶快救人脱离罪恶，尤其是年青人。”他明知苏联法律禁止向年轻人传福音，但“我们唯一的法律是圣经”——这是在残酷的无神论独裁统治下最理所当然的回答。

然后这党报就形容一个非常“野蛮”的画面：“少年男女们唱属灵的诗歌。他们接受洗礼，持守什么爱仇敌的邪恶教导。”《巴库工人报》(Bakinskii Rabochi)说及许多共青团员其实是基督徒！它的文章末了说：“共产党学校多么无能、无聊、缺少亮光。以至牧师们能够在他们冷漠的教育工作者面前争夺他们的学生。”

1966年6月30日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Kazakstanskaia Pravda)表达了他们的恐慌：他们发现成绩最好的学生竟然是一名基督徒男孩！

《吉尔吉斯真理报》(Kirgizskaia Pravda)在1966年1月17日提及一份地下教会写给母亲们的小册子：“让我们同心协力的祷告，当孩子们还在襁褓中时，就把他们献给神。我们必须救他们脱离世界的影响。”

这些努力非常成功。共产党的报纸证实了基督教在青少年中蓬勃发展！

苏联一份来自车里雅宾斯克(Celiabinsk)的报纸也形容一位女共青团员妮娜(Nina)如何因参加一个秘密的基督徒聚会而成为基督徒。

1966年第9期的《苏维埃司法报》(Sovietskaia Justitia)说及这样的一个地下聚会：“聚会在半夜举行。人们从各地前来。他们隐藏自己，小心翼翼，甚至对自己的影子也保持警惕。弟兄们在一间低矮又黑

暗的房子里聚集。出席的人那么多，连跪的地方也没有。由于缺少空气，那盏老油灯也熄了。人们都满头大汗。在外面的街头，一位神的仆人正在把风，防备警察的到来。”但妮娜却说在这样的聚会，人们以拥抱、温暖和关怀接纳她。“他们有一种伟大而启发的信仰（我现在也一样）——对神的信仰。神把我们置于祂的保护之下。让那些认识我的共青团员不睬我也罢！让他们藐视我，称呼我（就像用巴掌打我的脸）‘浸信会’也罢！我不需要他们。”

许多其他的少年共产党员也像妮娜，决定服事基督到底。

1967年8月18日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Kazakstanskaia Pravda)提及对克拉森(Klassen)、邦达尔(Bondar)、和泰勒欣(Teleghin)弟兄的审判。我们不晓得他们获得什么处罚，只知道官方公布他们的罪行是：向孩童传福音。

1967年6月15日的《苏联吉尔吉斯亚报》(Sovietskaia Kirghizia)抱怨说，“基督徒故意挑拨当局给他们施加行政措施。于是，无辜的共产党当局不断地被这些不满足于自由的顽固基督徒所激怒，再次逮捕了另一批人。”他们的罪行是拥有一架非法印刷机，十五台蜡纸印刷机，并六台装订机，用于印刷基督教文献。

1968年2月21日的《真理报》(Pravda)提及数以千计的妇女和少女在她们头上扎的缎带和腰间围的腰带上都印有圣经经节和祷告文。当局发现那个发动这新潮流（这新潮流我也推荐给西方）的人，竟是一个共产党的警察，一个名叫斯塔修克(Stasiuk)的基督徒。这报纸称这名基督徒被捕了。

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在共产党法庭上的回答，是被天上启示的。一名法官问：“你们为什么吸引众人信你们的非法信仰？”一位基督徒姐妹就回答说：“我们的宗旨是为基督赢得全世界。”

在另一场审讯中，法官说：“你们的宗教是反科学的。”那位受审问的女学生就回答道：“你比爱因斯坦和牛顿更懂科学吗？他们都是信神的人。我们的宇宙有爱因斯坦的名字——我的中学课本称之为爱因斯坦宇宙。爱因斯坦写道：‘如果我们将先知的犹太教和耶稣所传授的基督教，从后来添加的内容中，特别是从神职操纵的教权统治中加以净化，我们就会得到一种能够拯救世界免于一切社会罪恶的宗教。每个人都有

神圣的责任尽其所能使这个宗教获胜。’还记得我们伟大的物理学家巴甫洛夫 (Pavlov)! 党方的书不也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吗? 连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前言也说: ‘基督教, 尤其是它的新教教派, 是重建一个被罪摧毁的生命的理想的宗教。’ 我的性格已经被罪破坏了。马克思教我作一个基督徒以重建生命。你这个马克思的门徒, 怎么为这个审问我?”

那位法官哑口无言。

对于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这个指控, 一位基督徒在庭上的回答是:

“法官大人, 我肯定你不像发明氯仿(chloroform, 一种麻醉药)和其他药物的詹姆斯·杨·辛普森爵士(Sir James Young Simpson)那么精于科学。有人问他, 他最伟大的发现是什么; 他回答道: ‘我最伟大的发现不是氯仿。而是发现自己是罪人, 可以被神的恩典所拯救。’”

生命、自我牺牲、随时准备为信仰而洒鲜血——这就是地下教会所代表的基督教最有力的论证。这是非洲著名的宣教士阿尔伯特·施韦泽 (Albert Schweitzer) 所称的 ‘神圣的疼痛团契’, 就是忧伤之子耶稣所属的团契。地下教会凭着爱与救主联结, 也与教会的各肢体联结。这世界没有人能击败他们。

在一封秘密带出来的信件里, 地下教会写道: “我们不求成为更好的基督徒, 只求成为神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基督徒——有基督模样的基督徒, 乐于背负荣耀之十字架的基督徒。”

这些基督徒在被法庭审讯时, 总是拒绝泄露谁是他们的领袖。他们就如耶稣所教导的, 灵巧像蛇。

《东方真理报》(Pravda Vostoka) 在 1966 年 1 月 15 日报导说, 当官方问玛丽亚·谢夫丘克 (Maria Sevciuk), 是谁带领她归向基督时, 她回答道: “神引导我到祂的会所。” 另一名被告被问到 “谁是你的领导?” 时, 他回答说: “我们没有人类的领袖。”

共产党问基督徒的孩童: “谁教导你脱掉红领巾, 离开少先队?” 他们回答道: “我们自愿如此。没有人教我们。”

虽然在一些地方, 这冰山的一角公然显露, 但在另一些地方, 就比较隐藏。有些基督徒自我施洗, 免得他们的领袖被捕。还有一些地方, 信徒在河边施洗时, 施洗者和受洗者都戴着口罩, 免得被人拍照认出。

1964年1月30日的《教师报》(Uchitelskaia Gazeta)提及在沃尔内奇诺-科尔斯基(Volnecino-Korskii)区的沃罗宁(Voronin)村的一场无神讲座。当讲员讲完后，“信徒们马上提问，公开攻击无神论的教导。他们问：‘你们共产党员从哪里得到道德宗旨，就是你们只说不守的——诸如不可偷盗，不可杀人’？讲员不能回答”。这些基督徒就向讲员显示这些宗旨都来自共产党所反对的圣经。那位讲员完全被弄糊涂了。那场讲座的结果是信徒得胜！

对地下教会的迫害日益加剧

今日在前苏维埃共和国的一些地区的基督徒仍然受逼迫。在世界范围内的受限制国家中，地下教会的基督徒比以前遭受更多的压迫。据估计，仅1997年，就有大约16万基督徒殉道。基督徒听到犹太人在共产国家受逼迫，就感到心碎。但苏联与诸共产国主要的逼迫对象却是地下教会。多年前，苏联报章提及新一轮大逮捕。在一个地方，八十二名基督徒被关进一所疯人院。其中二十四人在数日后死亡，原因是“长时间的祈祷！”谁曾听说长时间的祈祷会致人于死地？你可以想象他们经过何等的折磨吗？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如果官方发现他们教导自己的孩子认识基督，就把他们的孩子夺去，使他们永远不得再相见，连探望孩子的权利都没有。

在共产党执政期间，苏联也在联合国签约，“反对教育方面的歧视”。条约说明：“父母有权按自己的信念，给自己的孩子们宗教与道德的教育”。在一篇文章中，苏联官方浸信联会的领袖，叛徒卡列夫(Karev)，保证这就是苏联的现状。只有傻瓜才信他！请看苏联报章的报道：

1963年6月4日的《苏维埃俄罗斯报》(Sowjetskaia Russia)提及浸信会员马加林可娃(Makrinkowa)的六个孩子被当局夺去，因为她教导孩子们基督教信仰，禁止他们佩带少先队的红领巾。

当她听到判决时，她只说了一句“我为信仰受苦”。这些孩子们被带走，去接受无神论的毒害，她还必须支付他们的寄宿费用。基督徒母亲们啊，想想她的痛苦吧！

《教师报》(Uchitelskaia Gazeta)提及同样的事也临到伊格纳季·穆林(Ignatii Mullin)和他的太太。法官要求他们放弃信仰。“你们要神，还是要自己的女儿？”那位父亲回答道：“我决不放弃我的信仰。”

保罗说：“万事都互相效力”（罗马书 8 章 28 节）。我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孩子，在被政府夺去之后，却在共产党的学校里传播他们在家里学到的信仰！他们不但没有中无神论的毒，反而把福音带给其他孩童！

耶稣说，爱自己孩子过于爱祂的，就不配作祂的门徒。（参马太福音 10 章 37 节）这话对铁幕国家的基督徒意义深远。

尝试一个星期不与你的孩子们相见！你就可以体会到在受限制国家的弟兄姐妹们所受的苦。据 1967 年 3 月 29 日苏联官方报章《青年旗帜》(Znamialunosti)报道，西特斯(Sitsh)太太因为教导儿子弗谢季斯拉夫(Vsetsheslav)敬畏神，这孩子就被夺去。扎巴玮娜太太(Zabavina)因为给父母双亡的孙女塔尼娅(Tania)“不正常”的基督教教育，就丧失这孙女的抚养权(见《苏维埃俄罗斯报》Sovietskaia Rossia, 1968 年 1 月 13 日)。在受限制的国家，这些基督徒父母的抚养权如今依然被剥夺。

我们不能单单提及新教的地下教会。

苏联的东正教基督徒也完全改变了。他们有数百万人下牢。牢中没有念珠、没有耶稣殉难的十架、没有圣像、没有坛香、也没有蜡烛。平信徒在牢中也没有神父。神父们也没有圣袍、没有面包、没有圣礼的酒、没有圣油、也没有印成的祈祷文。但他们发现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反而可以凭着祷告直接到神那里去。他们就开始祷告，神也开始把祂的圣灵倾倒在他们身上。于是，一个真实的灵命复兴（就如初期教会），就发生在共产统治下的苏联东正教。

于是在苏联与东欧诸国，出现一种东正教的地下教会。这教会实质上已是基要福音派教会，非常接近神。他们只在习俗上仍保留一点东正教的仪式。这教会有极多殉道者。谁晓得卡卢加(Kaluga)年迈的大主教

叶尔摩根(Yermogen)如今在哪里？他敢于抗议教会的元老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政府之间的背信弃义的合作，于是就忽然失踪了。

1990年代苏联共产党倒台，在苏共长达七十年的统治时期，苏联报章却充满了地下教会胜利的报道！地下教会经受了不可言喻的大苦难，可是依然忠心，而且继续成长！

我们在罗马尼亚向苏联驻军秘密撒种。其他人也在苏联本国，或在苏军进驻的其他国家进行撒种。这些福音的种子已经结果累累了。

我们可以为基督赢得共产亚洲和其他被共产党压迫的国家。我们的敌人可以变成基督徒！受这些敌人压迫的人也可以变成基督徒，只要我们帮助他们。

当今地下教会在共产主义苏联、在共产主义亚洲、以及在中东的蓬勃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明。

以下是几封来自苏联女孩的信件，让你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基督徒同胞的美丽（哪怕在可怕的光景下）。最后的两封信写自苏联监狱。

共产少女瓦利娅(Varia)如何找到基督

这三封信是一位基督徒少女玛利亚写的。带领共青团员瓦利娅信主的便是她。

第一封

…我继续生活在这囚牢里。我大蒙疼爱。牢中一位女共青团员也疼爱我。她对我说：“我不能了解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这里，那么多人侮辱你、伤害你，你却依然爱他们所有人。”我回答说，神教导我们要爱所有的人，不只是朋友，也包括敌人。过去这位少女给我很大的伤害。但我特别为她祷告。当她问我可不可以也爱她时，我就拥抱她。我们俩都痛哭。如今我们一同祷告。

请为她祷告。她名叫瓦利娅。

当你听到有人大声反对神，好像他们真是这样时，其实他们只是外表如此。后来你会发现，许多嘴上咒骂神的，心中却大大渴望

神。你仿佛听到他们的心在呻吟…这些人其实正在寻找一些事物，试图用他们的无神论填满内心的空虚。

你们在基督里的姐妹，玛利亚上。

第二封

我上一封信，提及不信神的少女瓦利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现在我赶紧告诉你们大喜的消息：瓦利娅已经接受基督为个人救主，而且公开向每个人做见证。

当她信耶稣，晓得救恩的喜乐时，她同时也非常不开心。因为过去她曾经宣扬没有神。如今她决定尽量弥补以往的过失。

我们与瓦利娅一同参加无神的聚会。虽然我警告她必须缄默，可是没用。瓦利娅出席，我也同去，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在众人唱完党歌（瓦利娅没有唱）之后，瓦利娅就上台在众人面前大胆见证基督为救主，又请求前同志们的饶恕，因为过去她盲目，不晓得自己正在灭亡的路上，还误导众人。她恳求众人放弃罪恶，归向基督。

所有的人都肃静，没有一人打扰。她讲完了，就以嘹亮的歌声，唱出整首基督教圣歌：“我不以宣扬基督为耻。祂为捍卫祂的诫命和十字架的大能而死。”

过后…过后他们就把我们的瓦利娅带走了。

今天是五月九日。我们依然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但全能的神会拯救她。让我们祷告！

你们的玛利亚上。

第三封

昨天是八月二日。我得与我们亲爱的瓦利娅在监狱中谈话。我想到她就心里流血。她还只是一个孩子，才十九岁。按她的信主年日，她也是一个初生的婴孩。可是她却全心爱主，马上行走那艰难

的道路。这女孩那么饥饿。当我们得知她入狱后，就开始寄送包裹给她。可是她只收到寄给她的一小部分。

昨天我看到她，苍白消瘦，又有被打的痕迹。只有她的眼睛发出来自神的平安，还有一种不属于地上的喜乐。

亲爱的同胞们，真的，这奇妙的平安不是一个未曾经历的人所能理解的。那些拥有这平安的人是多么的快乐…对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没有任何苦难或挫折能阻止我们…

我在铁窗外边问她说：“瓦利娅，你后悔自己所作的吗？”她回答道：“不，如果他们释放我，我就会再告诉他们有关基督的大爱。不要以为我正在受苦。我非常高兴，因为主那么爱我，并在我为祂的名受难处时赐给我喜乐。”

请特别为她祷告。当局可能把她送往西伯利亚。他们拿走了她的衣服和所有其他的物品。目前她除了身上穿着的，什么也没有了。她也没有亲属。我们必须为她收集最需要的日用品。你们寄给我的最后一次款项，我已分别出来。如果瓦利娅被遣送，我就把这些钱交给她。我相信神将会坚固她，给她力量承受将来。愿神保守她！

你们的玛利亚上。

第四封

亲爱的玛利亚，我终于有机会写信给你。我们已抵达（地名略去）。我们的营地离开市区十英里。我不能描述我们的生活，这是你知道的。我只想写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我感谢神，给我健康，叫我有体力可以做工。我和甲姐妹一同在车间操作机器。工作很难，甲姐妹的健康很差，我必须做我们两人的工作：我先完成我的份，然后就协助她。我们每天工作十二或十三小时。我们的食物和你们一样非常少。但这不是我想说的。

我心中赞美感谢神。祂藉着你带我走上救恩之路。如今在这路上，我生命开始有目的，知道往哪里去，又知道为谁受苦。我感到必须告诉每个人，向每个人见证在我心中救恩的大喜乐。谁能把我

们与神的爱分离？什么都不能。监牢与痛苦也不能。神给我们的苦难只会坚固我们对祂的信心。我的心那么充实，以至神的恩典涌流。工作时，他们诅咒我，处罚我，给我额外的工，因为我不能保持沉默。我必须告诉众人神为我做了何等的大事。耶稣已经把我造成新人。我这个已经在灭亡之路上的人，得到这么大的救恩，可以沉默吗？不，永远不能！只要我的舌头还能说话，我就要向每个人见证祂的大爱。

在去营地的途中，我们遇到了许多主内的弟兄姐妹。这真是奇妙：你初次见到他们，在灵里就晓得他们是神的儿女。完全不用言语。你第一眼见到他们，就晓得他们是谁。

我们前往营地的途中，在一个火车站上，一位妇人过来给我们食物，又说：“神活着。”

我们抵达的第一个傍晚（那时天色已暗），他们带我们到地下囚室。我们向里面的犯人们问安说：“愿你们平安。”令我们非常高兴的是，从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声响应道：“我们平安地接纳你们。”从那晚开始，我们就感到如同在一个大家庭里。

果真是如此。这里那么多人相信基督为个人的救主。超过一半的囚犯是基督徒。我们中间有好歌手，又有好讲员。黄昏时，在繁重的劳动了一整天后，我们就聚集在救主脚前，一起祷告。这是多么美好的聚会。有基督同在的地方就有自由。我在这里学到许多美丽的圣诗。神每天都加添给我祂的话语。十九岁时，我才第一次庆祝基督的诞生。我怎能忘记这奇妙的日子！那一天我不得不干了一整天的活，但有一些弟兄们找到机会到附近的河边破冰，做准备工作。夜间，我和七名弟兄就遵照神的话受了浸礼。我是多么快乐，我多么希望你，玛利亚，也能同在，好叫我可以为过去开罪你的地方忏悔。但神叫我们各人站在祂给的地方，我们必须在各自的领域站住。

请向神的全家问安。神必丰丰富富地赐福给你们，就如祂赐福于我一般。请读希伯来书 12 章 1-3 节。

我们所有的弟兄们都向你问安，他们因为你对神如此坚定的信心，并你在苦难中仍不断赞美祂而感到欣慰。如果你写信给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代我们问候他们。

你的瓦利娅上

第五封

亲爱的玛利亚，我终于得到机会写几句话给你。我可以告诉你，我亲爱的，靠着神的恩典，我和甲姐妹依然健康，感觉良好。我们如今正在（地名略去）。

我感谢你像母亲一样照顾我。我们收到了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我感谢你给的最宝贵礼物，就是圣经。代我向每个人道谢。在你写信给他们时，代我问候他们，感谢他们为我做的这一切。

自从主向我显示祂的神圣之爱后，我就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我受逼迫也是特殊恩典。我感谢主，在我信主的第一日开始，就给我为祂受苦的大喜乐。请替我祷告，叫我可以忠心到底。

愿主保守你们，坚固你们继续这场圣战！

我和甲姐妹向你们亲嘴问安。当我们抵达（地名略去）之后，或者我们有机会可以再写信给你们。不要为我们担心。我们高兴欢喜，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马太5章11-12节）。

你们的瓦利娅上

这是瓦利娅的最后的一封信——这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找到了基督，为祂作见证，后被判劳改。此后再无人听到她的消息，但她对基督的爱和见证，展现了受苦的、忠心的地下教会的属灵荣美。

第七章 西方基督徒可以如何帮助

人们称我为“地下教会之声”。地下教会是基督身体那么尊贵的一部分，我认为自己不配。

但在共产国家，我的确带领这地下教会的其中一部分许多年。我在被监禁（包括两年之久的“死亡室”）与遭受酷刑十四年后，依然存活，便是神迹。神又行更大的神迹，利用合适的时机，将我从监狱带出。罗马尼亚的地下教会决定，我应该离开我的国家，把消息带给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奇迹般地，我和家人得以离开，我得以完成托付给我的使命，就是如今仍然在一些被奴役国家劳作、冒险、受苦、牺牲的弟兄们所托付我的。

我代表那些正躺在无数无名坟墓里的众弟兄说话。我也为那些如今正在森林中、地下室、阁楼和其他场所秘密聚会的弟兄们说话。

地下教会的信息就是：

“不要离弃我们！”

“不要忘记我们！”

“不要放弃我们！”

“给我们所需用的工具，我们乐意付出使用的代价！”

这就是我所领受的命令。

我为地下教会——那沉默的、“哑巴的”、无法向外界发声的教会——说话。

请听被压迫国家里兄弟姐妹们的呼声！他们并不要求获得逃脱，不挂虑个人安危，也不想要安逸的生活。他们只求工具，得以对抗无神论对他们的年轻人——他们的下一代——的毒害。他们需要圣经，来传达神的话。没有圣经，他们如何传道？

地下教会就如一个乘坐火车外出旅行的外科医生。忽然这火车与另一辆火车相撞，导致上百号人躺在地上，肢体错位、受伤、垂死挣扎。这外科医生行走在垂死的人们中间，急得喊叫：“如果我有手术工具！如果我有手术工具！”这医生有心无力。若有手术器械，他就可以救很多人。他有心救人，却没有工具。地下教会正是这样。她何等乐意付出

一切，她何等乐意作殉道者，她何等乐意冒险坐牢数年！但没有可用的工具来发挥作用，这一切意愿都毫无价值。这些勇敢忠心的地下教会对自由世界的基督徒的请求是：“给我工具——福音书、圣经、基督教读物、并资助经费——至于其他的事，由我们来做！”

自由世界的基督徒可以如何帮助

每个自由的信徒都可以透过下述管道，立刻援助。

无神论者不承认生命有一个不可见的源头。他们对宇宙与生命的奥秘，一无所知。基督徒通过不凭眼见、而凭信心行事，过一种与看不见的神相交的生活，就可以感化身边不信神的人。

西方基督徒如果活出一个献身、真诚的基督徒的生命，就能最好地协助我们。每逢有基督徒在铁幕后受逼迫时，如果西方基督徒马上公开抗议，就能帮助我们。

西方基督徒还可以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的灵魂得救祷告，虽然这样的祷告看起来很幼稚：今天我们为共产党祷告，明天他们就给我们更厉害的酷刑。但主耶稣为耶路撒冷的祷告也很“幼稚”：祂祷告后，他们就给祂十字架。可是不过数日之后，这些人就捶胸懊悔，一日之间五千人悔改。（参使徒行传4章4节）

我们为其他人的祷告，也不是徒然的。凡不领受你祷告的，这祷告就带着更大的祝福归回你。我和许多基督徒过去常为希特勒并他的同党祷告。我可以肯定我们的祷告就如联军的子弹一样有效地打败了他。

我们必须爱邻舍如同自己。共产党员和其他施刑者也是我们的邻舍之一。

他们的出现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奉行基督的吩咐：“我来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翰福音10章10节）。基督徒没有叫每个人的生命丰盛。他们让一些人被排斥在一切有价值的生活的边缘，于是这些人就反叛，组成共产党或其他假宗教。他们常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以致于心中苦毒又残忍。我们必须与他们相争。但一个基督徒就是在与敌相争时，依然可以了解对方、爱对方。

对于有些人生活在叛逆中这一事实，我们并非无辜，至少是我们的失责。

为这个缘故，我们必须爱他们（这完全不同于喜欢他们），为他们祷告，这算是弥补我们的过失。

我没有那么幼稚，以为单凭爱，就能解决这些问题。我也不会劝告任何一个政府，单用爱去解决黑帮的问题。一个政府对待黑帮，必须靠警察、法官和监牢，不能单靠牧师。如果黑帮不肯悔改，就必须坐牢。对抗共产党和其他独裁者，决不能只用基督徒的爱，更需要用政治、经济或文化的力量予以制裁。共产党就像是巨大的国际帮派：街头的黑帮只会盗取你的钱包，他们却盗取整个国家。

但牧师与平信徒也必须带领这些叛逆的人（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以及受他们逼迫的无辜的受害者，归向基督。我们必须理解他们，为他们祈祷。

我们极需圣经

其次是，提供整本圣经或分卷圣经。只要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们愿意提供这些书籍给地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就有办法可以输送到铁幕国家的弟兄姐妹手里。当我还在罗马尼亚时，已经收到许多来自国外的圣经。输送和分发不是问题，只要有人愿意提供圣经。

他们极需圣经。共产国家如中国和北朝鲜，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已经几十年未见过圣经或福音书了。

当我还在罗马尼亚当牧师时，一天，有两位全身污秽的村夫来到我家买圣经。他们来自乡下，整个冬天为人铲除冻土，只希望赚取足够的钱，或许可以买到一本老旧的圣经带回家乡。因我常收到来自美国的圣经，就给他们一本全新的圣经。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要把做工赚来的钱给我。我没有收。于是他们带着圣经赶回家乡。几天之后我收到一封充满欢乐的感谢信，有多达三十名村民签名。他们已经仔细地吧圣经分切成三十份，以便彼此交换阅读！

听到一个苏联人乞求一页（不是一本）圣经来喂养他的灵魂，令人感到悲哀。他们不惜用一头牛或一头羊去换取一本圣经。有一个人就用

他的结婚戒指换取一本残破的新约全书。很多孩子们从未看过一张圣诞卡片。如果他们得到一张，全村的孩子们都会聚集，或许就有一个老年人会向他们解释婴儿耶稣、祂是由童贞女所生、以及基督与救恩的故事。这都源自一张圣诞卡！我们可以寄送圣经、福音书和其他基督徒读物到受限制的国家。这是你可以做的事。

我们也印刷和发送特别的书籍，对抗无神论的茶毒。从幼儿园到大学，他们在学校被灌输无神论。在苏联，共产党已经印刷了《无神论手册》一书，作为无神论者的《圣经》。幼儿园的孩子读这书的简易本。青少年的是更深入的版本。这本邪恶的《无神论手册》和它的无神论毒素就陪伴我们的孩童一起成长。我们为此印刷并分发了《答无神论者手册》，作为基督徒对有毒的无神论教义的回答。

我们已经中毒的青少年必须有个答案——神的答案——基督徒的答案——我们的答案！这是你们能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提供特别的读物（如连环画和儿童圣经）给这些国家（在这些国家，神是“非法的”）。

我们也必须与地下教会的弟兄姐妹手拉手，在经济上支持他们，让他们有交通费到各处进行个人布道。如今他们因为缺少交通费和食宿费，就被“困锁”在家。附近二、三十里外的乡村呼唤他们去参加秘密聚会时，他们都无法成行。如果我们每个月提供他们资金，就可以打开“锁链”，把神的话传到偏远的乡村。例如，我们可以购买摩托车给中国和越南的牧师们到他们国家的“禁区”传福音。也可以提供自行车给孟加拉国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冒着巨大的风险向穆斯林作见证。

我们必须在经济上帮助平信徒。因为基督徒的收入仅够勉强维生，使他们无法到各个乡村去传福音。每月给他们数美元便可以创造“奇迹”。

官方教会的牧师们，有些也冒着极大的危险进行秘密聚会。他们无视官方规定，愿意冒险服事青少年、孩童、和成年人。他们也需要资金拓展这些富有成效的秘密事工。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就是协助地下教会的成员有效地传福音。

另外，我们必须藉着广播电台，向被奴役国家传播福音。我们可以利用自由世界的广播站，喂养灵里饥渴的地下教会。他们极其需要生命的粮。因为共产党政府正在使用短波频道，向自己的公民宣传无神论，

所以在这些国家有数百万个收音机可以收听广播。福音广播的门是敞开的，这项工作必须拓展。地下教会必须得到这些电台提供的灵粮。这是另一个可以帮助地下教会的途径。

基督徒殉道者家属的悲惨遭遇

我们也必须给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提供帮助。数以万计的殉道者家庭面临极大的艰难。当一个地下教会信徒被捕时，他的家庭就大受打击，因为帮助这些家庭是非法的。这是当权者精心策划的，为要加深殉道者妻儿的痛苦。一个基督徒下牢的日子——通常这意味着酷刑或死亡——苦难方才开始。他的家庭开始受无尽的痛苦。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西方基督徒没有在经济上支持我的家庭，我们根本无法活到今天，更不可能写下这些文字！

殉道者的数目每时都在增加。尽管他们走向坟墓并获得天上永远的奖赏，他们的家人却活在极其悲惨的环境中。我们能够也必须帮助他们。当然，我们也应该支助饥饿的印度人和非洲人。但最该得到基督徒协助的，不就是那些在极权国家为基督而死，或在狱中为主受苦的基督徒的家庭吗？

自从我出狱后，殉道者之声这个组织已经寄送许多援助给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但这还只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足。

地下教会委托我带给你们的信息

作为一个幸存下来并逃脱出来的地下教会成员，我带给你们一个信息，一个呼吁，一个铁幕背后的弟兄姐妹们的恳求。

他们派我来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你们。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就是要传递这信息。

我已经告诉你们共产世界和其他被压迫国家急需得到福音。我又告诉你们，那儿的基督徒殉道者的家庭迫切需要援助。我也告诉你们，可以如何提供有效的帮助，协助地下教会完成传福音的使命。

当我的脚底被棍击打时，我的舌头（口）会发出哭叫的声音。为什么舌头会哭叫？它并没有被打呀。它哭叫是因为它与脚同属一个身体。你们自由世界的基督徒，与现在正在极权国家监狱里被殴打甚至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也同属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你们不能感受到我们的疼痛吗？

初期教会的一切荣美、牺牲和奉献，如今在这些国家再次活活展现在我们眼前。

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中痛苦祷告时，彼得、雅各和约翰就在一石之遥的地方，但他们却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发生之时陷入了沉睡。你对基督徒的关心和奉献有多少是用于救济殉道的教会？请问你的牧师和教会领袖，他们以你的名义为世界各地极权国家的弟兄姐妹们做了什么？

如今在这些国家，信徒就如初期教会的门徒一样英勇、殉道——而自由国家的教会却在沉睡。

我们在那里的弟兄姐妹，孤独无助，正在进行二十一世纪最伟大、最勇敢的战斗，他们展现的英雄主义、勇气和奉献精神，堪比初期教会。而自由世界的教会却在继续沉睡，对他们的挣扎和痛苦熟视无睹，就像彼得、雅各和约翰在救主痛苦时沉睡一样。

当你的主内弟兄姐妹为福音受苦和争战时，你也会沉睡吗？

你会听到我们以下的呼声吗？“纪念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抛弃我们！”

现在，我已经传达了来自忠诚的殉道教会的信息——来自那些在无神论共产主义枷锁下受苦的你的弟兄姐妹们的信息，他们正在世界各地遭受攻击，从印度尼西亚到非洲。不要抛弃他们。
